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3月31日第7期 总第217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17期

纪念何方专辑（二）

【追思】

资中筠 又一棵大树倒下了

毛里和子（日本）悼念何方先生（附：日文信原文）

杜 光 沉痛拜别何方老

丁东 邢小群 送别何方先生

傅国涌 路在何方——深切怀念何方先生

朱 正 回忆何方先生

杜明明 泪别又一个时代的猛士——杜导正忆何方

李 昕 《党史笔记》出版的前前后后——追忆何方先生

周 实 他当然是值得纪念的

王德禄 刘志光 访问“世纪和平老人何方”

崔卫平 最后一次见何方先生

张 弘 经历迷失的何方，晚年终以董狐之笔直面历史

王晓林 追忆亲爱的何方伯伯

叶维丽 悼念何方叔叔兼议道德创伤

黄 星 追念何方

张秀君 怀念何方爷爷

张勤龙 张闻天研究的领军人物

詹志芳 忆何方伯伯

陈启懋 忆何方

茅于軾 何方是敢说真话的老干部和自由派学者

【挽文】

日本研究所 李锐/张玉珍 杜导正 贺卫方 杨继绳 周阳 日本所友人
刘德有 张森根 (台) 陈永发 (台) 余敏玲 拜怀德 何蜀 胡甫臣
马耀徽 韩效琦 李梅彬 郭健 余南南 余咏恩 胡健 周振中 姬涛
苏小玲 朱烈/兆梅 李同文/孙林 李薇 小平/娜亚 高西庆 张懿宸
陈翠玲 施燕华 瞿建中 宋明江 舒鼎/周凤仙 啟 之

【挽联】

陈远 陈远焕/邓伍文 陈 兵 陈世和 丁东/邢小群 丁颖 杜莉 傅国涌
郭于华 韩三洲 雷颐 何振华 何迪/王苗 贾新民 李锐 李南央 李永忠
李文子 李逊 李汝高 李仲明/谭秀英 李 昕 刘火雄 刘济生 牟广丰
秦 晖/金 雁 商昌宝 施滨海 石高宏 苏小玲 孙 承 孫國棟 王东成
王道诚 王玉成 王海光 王春瑜 王德禄/刘志光 皖 兵 吴 敏 謝小玲
谢健明 萧 扬 徐庆全 徐友渔/崔卫平 阎长贵 余世存 曾景忠 展 江
张 弘 张立华 张 烨 张勤龙 章立凡 章诒和 赵诚 赵锋 周为民
智效民 郑仲兵 朱海燕 香港中和 吴迪/叶冰冰

【挽诗 旧体】

冯克力 姬 涛 陆纪 梁重庆 牟广丰 晓 洲 周振中

【挽诗 新体】

郭世佑 木子鱼 刘红英 应 约 李占柱 王晓林

【何方资料】

何方年表

媒体报道

学术自传

【本刊声明】

【追思】

又一棵大树倒下了

资中筠



何方走了！又一棵大树倒下。尽管人终有这一天，95岁也算高龄。但是刚接到噩耗，仍感突然，难以接受。特别是已经约定10月5日与杨成绪一起登门探望，却晚了一步，缘慳最后一面，成为永久的遗憾。

无论资历、年龄、学识，何方都是我和乐民的前辈，而进入老年以后，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谊在师友之间。08年乐民先走，何方十分悲痛，曾为长文悼念，引为挚友。近年来，故人凋零，不断接到讣告，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每当至亲好友离去，总是一时间失语，要好久以后才能理出思绪。此时此刻，黯然神伤，百感交集，似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想起何方85岁时，乐民曾写“仁者寿”横幅为贺。并送一扇面，写诗一首：山上一老松，人间一仙翁，手持董狐笔，笔底八面风。

宋以敏是我清华校友。多年来，对何方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和支柱。可以说，何方无以敏无以终余年，更无以完成那些宝贵的传世之作。除已经刊印成书的作品外，还有最后口授，以敏为之整理的大量遗稿。但愿这些基于独家阅历和独到见解的珍贵论述不会长久藏之名山，而能早见天日，嘉惠后人。

逝者已矣！愿生者节哀珍重，是至亲好友的深切愿望。■

【追思】

悼念何方先生

早稻田大学教授 毛里和子/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徐显芬/译



10月4日清晨，惊悉无比敬爱的何方先生仙逝的噩耗，万分悲痛！刚刚在此前9月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播放的特别纪实节目中，还很高兴地看到了接受采访的何方先生很精神的音容笑貌。

何方先生自1980年代开始就任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引领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以及中日间的学术交流。实际上，我在拜见何方先生的老早之前，就已多次拜会夫人宋以敏先生。宋先生自1980年代初就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著名国际政治专家。我当时作为日本外务省相关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参加了日中两研究所间的一年一度的对话。每年一次拜会宋先生，聆听她那高瞻远瞩、清晰明辨的高见，无上愉悦。

得以拜见何方先生，直接聆听先生的教诲，在我的记忆中是1990年代末，具体的应该是在1998年于北京召开中日和平条约签订20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之际。当时的学术对话是在非常温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自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期间2005年中国发生反日游行以来，日中关系乌云笼罩。其后2013年6月，我有机会直接前往采访先生。日本研究所的林昶研究员做了周密的安排，华东师范大学的徐显芬教授跟随翻译。我们到北京郊外先生的寓所，连续两天聆听了先生的教诲。采访之前拜读了先生刊登在《炎黄春秋》（2012年11期）上的文章，感受颇深。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没有把日本对外侵略看成是民族犯罪，而总是以所谓阶级斗争的观点，把这只归罪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特别是还一再说日本人民和我们一

样，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就混淆了是非。”这里明确否定了中国过去对日本的主流认识和说法，明确指出把极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与同是受害者的一般国民区分开来的二分论是错误的。

对先生的采访，于2013年6月和2016年3月进行过两次。每次，何方先生和宋以敏先生都非常真挚且恳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采访之后，我深深体会到了先生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对我提出的问题——“您说要取消二分论，是否考虑要就包括赔偿问题在内的日中间战争问题进行重新处理？”先生如下回答道：

“不是的，这是认识的问题。我不是说要重新再处理一次这个问题。你是研究者，我也是同样的立场，我们现在说的只是认识的问题。至于将来怎么处理，我们没有决定的权力，也没有好的意见。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去年3月，在采访接近尾声时，我跟先生这样说道：“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以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和中国的日本研究者为核心的东亚知识网络？本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至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都是在‘一国现代化主义’之下‘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是否已经到了两国都告别‘一国现代化主义’，努力建立以地区乃至全球发展为共同价值的网络的时候了？”

先生毕生对中日关系以及日本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时，先生离我们而去，我感到无比悲痛！在此，我们保证，遵循先生的教导，作为一名研究者，要为推进客观的中国研究、日本研究以及中日关系研究而努力奋斗！

安息千古！ ■

附件：毛里和子教授的日文原文

何方先生を追悼する

日本・早稲田大学名誉教授 毛里和子

2017年10月4日

10月4日早朝、悲しいニュースが入りました。敬愛してやまない何方先生が亡くなったというお知らせです。9月のNHK TVの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では、インタビューされる何方先生のお元氣な姿を拝見し、とても嬉しかったのですが。

何方先生は1980年代から社会科学院の日本研究所の所長として中国の日本研究、および日中の学術交流をリードして来られました。実は、私は、何方先生より、奥様の宋以敏先生にお会いした方がずっと早いのです。宋先生は中国国際問題研究所の国際政治の論客として80年代初頭から有名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私は日本外務省に関わる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の研究員として日中の両研究所の年一回の対話に参加してきました。毎年一回、宋先生とお目にかかり、リベラルな、でもはっきりした宋先生のご高見を伺うのがとても楽しみでした。

何方先生とお目にかかって直接お話しをする機会を得たのは、私の記憶では、1990年代の末、具体的には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の20周年を記念して1998年に北京で開かれた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このころは、学術対話もたいへん和やかに楽しく行われていました。

小泉首相の靖国神社参拝以来、とくに2005年の中国での反日デモ以来、日中関係には暗雲が立ち込めました。その後2013年6月に、先生と直接インタビューする機会を頂戴しました。日本研究所の林昶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学の徐顕芬教授が手配と通訳をして下さいました。北京郊外のお宅に伺って、二日間ゆっくりお話しを伺えました。どうしてもお目にかかりたかったのは、先生のご論文『炎黄春秋』（2012年11月号）で衝撃を受けたからでした。先生は、このご論考で、「日本の対外侵略を民族の犯罪とみな

さず、階級闘争の観点に立って、ごく少数の軍国主義分子にだけ罪を着せ、日本人民をわれわれと同じ被害者とみなしたことは是非を混淆する誤りだった」、「ごく少数の軍国主義者と犠牲になった一般国民を二つに分ける二分論はまちがっていた」とこれまでの中国の公式見解をはっきり否定なさったのでした。

インタビューは2013年6月と2016年3月の二回に及びました。何方先生も宋以敏先生も私の疑問に真摯に、また丁寧にご答えて下さいました。結局インタビューの結果、次の先生のお考え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先生は、「二分論を取り消すと言っても、賠償問題を含めて日中間の処理をもう一度やり直すべきだと考えておられるのか」、という毛里の問いに、次のようにお答えになりました。

「そうではない、認識の問題なのだ。この問題をもう一度処理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言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貴女は研究者だ。私も同じ立場だ。われわれのいま語れるのは認識の問題だけなのだ、将来どのように処理するのか、われわれはそれを決める権利はないし、いい意見も出てこない。もう過ぎ去ったことなのだ。」

昨年3月のインタビューの最後に私は先生にこう申しました。「日本の中国研究者、中国の日本研究者を中核にして東亜の知的ネットワークを作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そもそも日本は明治維新以来いままで、中国は改革開放以来いままで、一国近代化主義で「己のことのみに専念して」きました。もう両国ともに一国近代化主義を卒業し、地域およびグローバルな発展を共通の価値とするネットワークを考えよ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と。

先生は日中関係、日本研究に多大の貢献をなさった上で、われわれをおいて旅立たれました。とても寂しくなりました。でも、先生のお教えに従い、研究者として客観的な中国研究、日本研究、中日関係研究のために努力をすることをお約束致します。安らかに休息下さいませように。■

【追思】

沉痛拜别何方老

杜 光



惊悉何方老于10月3日去世，不胜哀悼！

进入新世纪以来，被杨继绳称为“两头真”的老人，如李慎之、胡绩伟、李普、于光远、杜润生、戴煌、李凌、李公天等，先后陆续谢世，使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士，深感悲切沉痛。现在，何方老又走了，国家失去一位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战士，社会少了一位守卫着真理和良知的哲人。我为国家和社会的不幸而悲哀！

何老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经过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献出他的真知灼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为何老所写的《何方同志生平》里，概括了他的出色贡献：“何方同志最早提出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观点，并著有《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一书，突破了在这个影响全局问题上的羁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在党史问题上，结合个人经历写有《何方谈史忆人》、《从延安一路走来》等著作。关于日本问题，他主张从国家的基本战略利益出发发展中日关系。”

在《何方同志生平》概括的何老晚年三大贡献中，我认为最有社会价值、最有历史意义的，是他对党史研究的拨乱反正，特别是从遵义会议到整风运动的党史。人们过去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多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这个决议说遵义会议为“毛泽东同志所领导”，它“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整风运动则“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后人在文章书报里，往往还加以强调，如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整风运动则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何老在《党史笔记》一书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说明“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才成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何老详细地引证历史事实，描述了毛泽东确立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的历史过程。从对军事的领导来说，遵义会议决定成立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三人组成，组长是周恩来，是“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长征期间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才提议由毛泽东负责军事。长征结束红军抵达陕北后，在1935年11月3日召开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建议成立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但当时只限于对一方面军的领导，因二、四方面军尚未会合。“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

至于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也是几年以后的事。何老指出：“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并非“为毛泽东所领导”。何老引用大量文献，证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有人统计“前后多达137次”。当时张闻天不但代表党中央，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主持党中央同各方面的联系，派遣到各地的领导干部，处理重大组织问题，而且负责起草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战略方针的报告和决议，在中央会议上作政治报告和结论。而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或起草决议，基本上只限于军事问题。何老在书中还举出许多历史细节，以证明党中央到延安后的前几年，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如：以常委名义发布的文件电报，署名一般都由张闻天打头，1938年后的电报才多以毛打头；“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毛泽东“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刘英则被戏称为“娘娘”，毛泽东还自封为“毛大帅”；1936年红军东征山

西，张闻天随军行动，有人戏称为“御驾亲征”；当时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会议，几乎每次都是在张闻天的住处开的，各地领导人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大多到张闻天的住处；1937年11月刘英到苏联养病，王稼祥领她去见季米特洛夫，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这些细节都可以为张闻天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提供佐证。

毛泽东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是1938年以后的事情。“直到1938年，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都是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之间的合作”。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此后，这种合作就发生了变化了，张闻天虽然名义上仍然是总书记，但全党全军的实际领袖却是毛泽东，开会地点改为毛泽东的住所，发电报的署名也由“洛、毛”改为“毛、洛”。虽然如此，毛泽东的威望却没有达到全党拥护和爱戴的地步。例如周恩来、朱德在整风前发表的文章里，都没有引证毛泽东的话；刘少奇在1939年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1941年写的《论党内斗争》，也没有一处引述毛泽东。整风开始后，引证毛泽东的话才成为写文章、作报告的常规。

这个细节彰显出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和这一场运动的意义与作用，那就是“为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地位”。何老指出延安整风的双重意义：在上层，是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下层，是打掉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平等观念和极端民主化。“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张闻天”，反对教条主义以曾经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为首要对象，这是可以理解的。

何老说：“由于始终没有允许并组织深入研究和探讨，至今有关延安整风的著述与教学，总显得有些模糊以至混乱，不少问题上还存在自相矛盾真假不分的现象。”他精辟地指出：“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模式、领导体制、宣传教育，以及上层建筑其他方面，包括历史编纂学在内，都还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还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何老在这里认为：延安整风的传统“还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真是掷地有声，足以惊世骇俗！我们几十年来的折腾，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到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六四镇压、三个代表，以至五不搞、七不讲、不许妄议等等，“都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这就告诉我们，要检查反思历史上的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研究和探讨”延安整风入手。我认为，何老的这个真知灼见，是他留给后人的重要财富。

何老一生坎坷，晚年大彻大悟，致力于探求真理，追寻历史真相，为社会作出突出贡献。不幸最后仍然遭受不应有的迫害。去年5月，进驻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王怀臣为组长的中纪委巡视组，竟然给何老加上“长期以来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等罪名，强令何老检查，使老人蒙受极大的痛苦，激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抗议。我为此写了4篇抗议性的评论，写完第一篇后就被禁止发声。年过九旬的何老蒙此羞辱，其影响健康可想而知。

日本研究所的《何方同志生平》肯定“何方同志在长期的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精神，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在他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一贯重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重视学术上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见解和政策意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这里，对何老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敢于直面历史”、“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见解和政策意见”，都作了积极的评价，实际上否定了中纪委巡视组的指责。官方能如此论定，也可算是难能可贵了。

何老走了。大概像其他已故“两头真”老人一样，带着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心告别人世。封建专制主义虽然只不过是泥足巨人，但它至今依然狰狞强大，令人恐惧。我们只能谴责它，却无力撼动它。何老在世时如此，何老去世后，我们这些幸存者也只能如此，无奈它何啊！何老地下有知，大概会和我们同声一叹！

永别了，何方同志！■

2017年10月5日

【追思】

送别何方先生

丁东 邢小群



10月3日上午10时，何方夫人宋以敏老师打来电话：何方今晨去世了！我们急忙赶往顺义何宅，何方儿子何宁告诉我们，凌晨两点父亲突然咳嗽，状态非同往常，刚抬上急救车，心电图就成了一条线。中午章诒和赶来，一起商议后事办理。十

九召开在际，空前紧张。下午3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将研究何方治丧事宜。我们向家属建议，丧事由日本研究所主办，生前友好，以民间方式参加。章诒和说起35年前张伯驹遗体告别，当时挽联数量之多，水平之高，至今难以忘怀。送挽联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以语言精练、文辞工整为特色，适宜当下表达对逝者的缅怀。目前虽难以重现张伯驹当年的盛况，但可朝这个方向尽力。当时傅国涌从杭州打来电话，委托代送花圈。我说，你不如以挽联的方式表达哀思。傅国涌很快拟出一联，“别了临潼，少年青年，从延安一路走来，反思有泪；退居京师，党史国史，到暮年两手作文，铁面无私”，用微信发来，我们马上转发，许多朋友由此得知何方逝世，纷纷撰写挽联，到10月7日，已经收到各届人士挽联近60幅。作者多为何方生前友好，如章诒和的挽联是：“十载契相知，犹觉兰言在耳；今秋悲永诀，那堪月影招魂”。也有人没见过何方，却是他的忠实读者，如李逊的挽联是：“高贤何方，虽缘慳一面，有存信史传吾人；今朝董狐，敢不隐书法，无惧秋肃临天下。”几十幅挽联从不同侧面表达各自感受，合在一起，涵盖了何老一生的道德文章。

事先预计到众多挽联到遗体告别现场悬挂有困难，家属便印刷成册，准备分发来宾。8

日在协和医院举行遗体告别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副院长提出了反对意见。最后达成妥协，用墨笔涂去杜导正的“唤起民众，实现宪政”八字，方得以分发。总算以变通的方式，表达了各界人士对何方的崇高敬意。

二

何方先生出生于1922年10月18日，差半个月就满95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波澜起伏，历尽沧桑。我们送他的挽联是：“审时代大潮，倡和平大局，面折廷争真国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去芜存菁太史公”，想以此概括他一生的两大贡献。

上联说的是研究国际问题。1986年，何方率先提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他主张二战以后全球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时代特征上，革命只能与战争相匹配。发展则总是同和平相匹配，因为要发展必须有和平的条件，以和平为基础。此前中国领导人遵循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我们处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立足世界革命，对内强化阶级斗争，对外准备打仗，国际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人民生活连温饱也没有解决。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位高权重的陈云发表《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谈话，说“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邓力群奉命在中南海组织批判会，何方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数年后，官方终于承认，现代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潮流是和平与发展。何方从人类文明和全球战略高度，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重新审视六十多年来的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实际运作，检讨毛泽东等几代领导人决策的得失，反思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中印战争、中苏边境战争和对越战争的教训。他是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先行者。1989年到1995年，他出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先后向决策者建言，解除戒严，放方励之出国，尽快与韩国建交等。他的意见，不论当局是否采纳，都是有益于民族和国家的大智慧。

下联说的是他研究中共党史。何方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张闻天的助手，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6年参加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外交部分的起草。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挨整，何方在外交部

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安徽劳动，几乎饿死。改革开放以后，对张闻天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并没有一步到位，连他在1935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历史事实也得不到承认。这成为何老耄耋之年研究中共党史的心理动力。张闻天夫人刘英是党史的重要见证人，晚年与何方有过多次深谈，讲述了许多于史无载的高层细节。何方本人既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经历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看问题高屋建瓴，不为成见所拘，文字逻辑周密，概念精确，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大面积突破，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触目可见，他从根本上反思了中共党史编纂学的积弊，开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家之言。

三

我们认识何方是2003年。那年春天李慎之去世，丁东编纪念文集，收到何方的《悼慎之》，知道李慎之有个老友何方，不久，从何家栋处又看到何方的四篇党史学习笔记，感到水平不凡。正巧一个出版界的朋友来北京，想寻找优秀书稿，于是丁东和他拜访了何方。因为此前互有耳闻，何方很热情。他侃侃而谈，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时常跳出。丁东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于是问何老是否有兴趣做口述历史。如果愿意，邢小群可以与他合作。何方此前看过邢小群采访李慎之等人的文章，印象很好。于是同意采访。邢小群先后采访何方二十多次，她把何方的口述梳理成稿，打印出来，交何方先生修改。何老修改了一部分，重写了一部分，又觉得既然总结一生，就应该系统表达自己对重大问题的思考，于是再加写十几万字，最后取名《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何方先生原来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参加革命后如饥似渴地恶补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说起中外文学名著如数家珍，出口成诵。文革期间下放劳动，他还学成了很好的木匠手艺，现在还珍藏着当年自制的木工用具。何方先生的思维也像木匠活一样，一丝不苟，见棱见角，锋快犀利。不论评说历史，还是审视现实，绝不含糊其辞。何方夫妇与我们成为忘年交。不但常留我们吃饭，连朋友送给他们的新茶，也要邀我们分享。我们还曾邀何方夫妇到我们居住的村里一处自然风景区闲游。

何方先生原先社交圈子主要在外交和国际研究领域。后来又在《炎黄春秋》结识了一

批志同道合的老人。他说，是我让他结识了一批其他领域的中年朋友。这些朋友的专业可能是文、史、哲、经、政，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关注公共领域。章诒和发表文章触及到文化名人卧底、告密问题，引起很大争议。一些资历相仿的老人不赞成揭疮疤，而何方则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使章诒和颇受鼓舞。

2011年10月19日，是何方89岁生日的次日，按照传统，老人生日过九不过十。这一天，我们和学界朋友举行了一次何方学术思想讨论会，萧扬、马立诚、钱理群、资中筠、杨继绳、雷颐、吴思、崔卫平和我们先后发言，傅国涌和徐友渔寄来了书面发言，就何方学术思想进行了一次认真的研讨，何方夫妇颇感快慰。

几年前，我儿子在万科城市花园安家，与何方成为邻居。我们和儿子一家团聚，便可到何宅走动。所以何方最后五年和我们来往不断。

2014年底丁东参加《炎黄春秋》编辑工作，何方担任《炎黄春秋》顾问，与李锐、杜导正并称“炎黄三老”。丁东在炎黄工作一年零七个月，其间风雨不断，少不了要与何老沟通切磋。其中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刘英与何方的多次深谈，何方保存了录音磁带。我们建议整理出来。后宋以敏老师整理出八万字的文本。《炎黄春秋》曾选发有关外交部的一段。丁东参与编辑工作之后，又分三次，以《刘英回忆红军时代》、《刘英回忆延安岁月》、《刘英回忆张闻天晚年》为题，选登了三万多字，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其二是面对外界压力，何方一向力主稳健应对。2016年初曾为一篇文章的争议，多人主张“玉碎”。何方力挽狂澜，使得刊物又多活数月，总算坚持到25周年。

老《炎黄春秋》沦陷后，杜导正多次登门看望何方，今年李锐过百岁生日，“三老”亦有聚会。直到9月下旬，何方做东，请李锐、杜导正吃饭，三老最后一次聚会。杜老还向李锐提出建议，如果应邀出席十九大，可提出几点建议。

9月24日，傅国涌应邀到后沙峪一家学校讲学，想趁便看望何方先生。丁东当日乘高铁从常州返京，傍晚来到何宅，何老留吃晚饭。然后和傅国涌等一起畅叙，当时何方精神颇好。说起95岁生日，何方说还差一点。没想到这竟成为与何方的最后一面。■

【追思】

路在何方？

——深切怀念何方先生

傅国涌



9月下旬，我打电话到何方先生家，想寄本书给他们，电话是宋以敏阿姨接的，她说何先生出去晒太阳了，多年不见了，问我何时会去北京。我说过两天就去京，但不知落脚在哪家宾馆，不确定能不能去看望他们，书还是先寄走。9月23日，我在北京，知道次日住在京郊，离他们家所在的万科城市花园不远，我打电话给宋阿姨，说晚上去看他们，她马上说要请我出去吃好吃的。我说吃了晚饭去，还约了丁东老师一起在他们家见面。

24日晚上，我到时，何先生正在泡脚。我见他精神颇佳，还记得十二年前我们在西湖边的见面，甚至记得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们一班同学作弄宪兵的往事。我在沙发上坐下后，宋阿姨递给我一本书，还有一个大信封。书是李锐老先生的《李锐时期集》，原来是23日我打电话后，正好何方先生和宋阿姨要请李锐先生和杜导正先生吃饭，他们知道我第二天要来，就为我要了一本签名本，扉页有101岁的李老以略微颤抖的手题的签，他们年事已高，仍如此细心，令我感动。大信封里是何方先生最后想要完成的一本共和国外交史方面的书稿，有目录（共七篇，加六个附录），卷首语和已经完成的二篇打印稿。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都放在这本书上，在宋阿姨住房外的阳台小桌子上，我看到了他写的不少手稿，估计还没有整理出来。夜色暗淡，我没有细看内容。

其实，我与何方先生相识不过十二年多，第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8月，《党史笔记》出版之后。我先已读到这本有分量的沉甸甸的大书，但不是原书，只是从朋友那里辗转看到的复印件。他是1922年生人，少年时去了延安，以后成为张闻天的重要助手，在中国

驻苏联大使馆和外交部工作，也因此 在 1959 年就厄运降临，经历了大饥荒、“文革”带给他的创伤。他最后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任上退下来的，在国际研究上有重要建树，提出了当今世界正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理论判断。晚年他住在京郊，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并反思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中共党史上被搞得扑朔迷离的那一段。他为还原党史、外交史真相，耗费暮年光阴，并在邢小群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个人史《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这些著作的陆续问世为他在民间和思想界赢得了声望，章诒和、资中筠、丁东等先生都很推崇他。

我们第一次见面即是在他住的万科城市花园一楼，何先生送了我一套原版的《党史笔记》。我回家又读了一遍，当时我正好给《凤凰周刊》的“三地书”栏目写专栏，就写了一篇评论《何方：颠覆了“中共党史编撰学”》。不久他们南下杭州，住在西湖边的望湖饭店，约我见面。一见面，他就用临潼口音对我说，你的文章给我惹了麻烦。我吃了一惊，他才解释说，因为很多人读到这篇小文向他索书，而他手头已没有书了。

从那时起，我们陆续有通信，每次他有了新作都会寄来打印稿，有新书出版也必寄我一份。十二年来，他赠我的书已有厚厚一摞，有的书既有自印本，也有公开出版的，有的既有平装版，又有精装本，打印稿也不少，上面都有何先生的签名。大约 2011 年下半年，何先生 89 岁生日前夕，北京有师友来电希望我去一趟，当时我正好在西安，转道北京去看望何先生，并提前录了一个视频，谈了我对何先生的认识。因随后的生日聚会我路远不便参加。这次聚会于 10 月 19 日在他家举行，与会的有资中筠、萧扬、钱理群、杨继绳、马立诚、丁东、邢小群、崔卫平、雷颐、吴思等十来个人。正是这次聚会，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何方之问”，即何方先生在自述前言中提出的——他们当初怀抱为自由民主的理想而投身革命，最后不仅这个理想渐渐被淡忘了，而且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越远，甚至走向了对立面，他追问是当年的理想选错了，还是后来背叛了当年的理想，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理想是不分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地反思？

当然，同样的问题，1915年生的顾准在1974年，1920年生的许良英先生在1980年代、1923年生的李慎之先生在1999年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时都已触及。他们大致上算是同一代人。

2012年9月，我和一位朋友相约一同去何先生家，两位老人执意要找一个好饭店款待我们，那是他们曾吃过的一家饭馆，他们觉得菜好。午餐后，我们想让何先生休息，他不肯，一定要坐在沙发上听我们聊天，时不时还会接几句。我特别记得那天他还背诵了小时候读的地理课本和国语课本。我们说他记忆力好，他说自己只念到初中，就那些课本，所以牢牢地记住了。当时，我们大约说起了民国课本。别后不久，我就收到宋阿姨写来的一封信。

国涌：

很感谢你专程来我们家，还呆了那么长的时间。何方从你们的谈话中得到新知识，受到新启发，前天又从共识网上看到你发出写他的文章，他很是高兴。……

他去年9月摔了后脑勺，一年来写东西很少。附件里的第一篇是新作，这是一年来写得最快的一篇，吴思已经决定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第二篇是摔伤百天后应社科院要求写的（大概只能存档，不会发表），花了一个月完成。他正在写《对共和国前期外交的反思》，写好的绪论已发表在《何方杂谈》里，之后只完成一章（《炎黄春秋》已登，附件里是未经删改的文本）。希望他以后进程能快一些。

宋以敏

在这之后，我写信请教基辛格《论中国》有关邓小平在外交上的12字方针。宋阿姨9月29日回信说：

按我们的理解，邓在韬光养晦等24字方针之外并无另外的12字方针。情况是这样的：24字并非一次就完整地提出来。第一次是在苏联“八一九”未遂政变后，当时李鹏……表示，苏联不行了，得由中国扛起社会主义大旗。杨尚昆向邓反映这个意见后，邓当即提出12字，大概是“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一开始这12字传达范围不大。后

来邓又加了“决不当头，善于守拙”两句。“有所作为”是他在其他场合提的。后来外事部门把各次提的捏在一起，弄成24字，并把原来只针对苏联变化扩为适用于整个对外策略。记得当年“八一九”政变一发生，中央认为形势大好，外交部紧急传达，《人民日报》准备发社论庆贺，贺词等都已排版。多亏很快失败，否则就要出洋相了。基辛格的12字也许就是这么来的。以上供参考。

此后不久，网上流传一份所谓“邓小平的政治交待”，我写信向先生求教真伪，宋阿姨转给我何先生本人署名的回复，时间是10月9日，我猜想是何先生在纸上先写好，宋阿姨打字的。他认为这是伪造的，并提出四条根据：

一是个人立政治遗嘱不合乎共党传统，而邓则是个铁杆共产党人。……

二是内容相悖。邓是一生不讲民主法制的人，历来与民主为仇，此件却大谈民主，显系伪造。

三是风格迥异。邓的讲话和为文，一个显著特点是简洁明快、一锤定音，决不含糊其词，拖泥带水。而“交待”则多有含混，对六四镇压讲了一大段竟不知所云。

四是邓以毛泽东第二自况。而毛是从不下罪己诏的。……此件虽尽量模仿邓的文风，但终究不像。

当年12月16日，宋阿姨收到我寄去上次见面的合照之后，来信说：“我们都还行。何方写作没停，只是特慢。他的思想倒是还在进步之中。比如，他近一年来一直讲马克思有四条不对，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反私有制，最近又加上第五条——国际主义。这大概同他对世界革命思想造成危害的思考有关。在网上能不时见到你的新作，一发现我就一定打印出来让何方读。正在喝你们上次带来的家乡绿茶，喝上就会重温上次愉快相聚。”

去年9月12日，G20过后，我接到宋阿姨的来信，其中提及：“何方老矣，多亏脑子尚好，我现在就是力求把他的所知所思在他有生之年变成文字。最后不论能以什么形式出

来，最不济也可变成光碟留下来，一定会送上请你指正。”

离上次见面差不多五年了，这次一见面，宋阿姨说何方先生将要过九十五岁生日。我们见他面色红润，记忆力还好，虽然腿脚不便，临走时还执意要站起来送我们。我们都满以为他也能像李锐老先生一样长寿。“仁者寿”，陈乐民先生手书的三个大字就挂在沙发背后。不料仅仅一个多星期，就惊闻噩耗，何先生走了，我带回的大信封里的未完成之作成了遗稿。好在宋阿姨说会把他的遗稿整理成书。

宋阿姨 1943 年进入重庆南开中学，1948 年考入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1948 年底清华园易手，实际上就不再上学了。到 1949 年 5 月她就进入为日后成立外交部准备基层干部而设的外国语学校政治班，此时离 10 月 1 日还有近半年。她比资中筠先生小一岁，很羡慕资先生在清华外文系读到毕业，能走学术道路，其实宋阿姨聪明能干，65 岁被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开始学用电脑，是何先生晚年写作的重要助手，何先生的手稿或口述多数是她整理的，我写信给何先生，也都是宋阿姨代他回复。她籍贯金华，虽然从小在上海长大，对故乡还是怀有感情，所以对我这个来自浙江的晚辈多有关爱，言语之间充满热情。她虽自谦早年弃学投奔革命，一生只能做事务性的工作。实则南开中学给予她的教养和文化基础都相当好，无论待人接物，还是处理文字，都那么得体，尤其善于倾听别人说话，我常常见她掏出一个小本子，记下谈话的要点。这种习惯想必是长期的工作中养成的。她与何方先生晚年住在京郊，几乎全力帮助何方先生整理著述，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国际的动态。我与他们见面次数不多，却受益颇多，尤其受到他们的厚待，他们多次对我说，任何时候去北京都可以去他们家吃住，让我铭感于心。

何先生，翩翩临潼一少年，从延安一路走来，一个人就构成了一部世纪沧桑史，说实话，他晚年若无宋阿姨这个得力的帮手，要完成这么多著作也是很难想象的。9 月 24 日晚上临别时，宋阿姨想起了什么，赶紧到另外一个房间，搬出一堆何方先生在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手制的木工工具，上面刻着年份：1974 或 1975 年。他们客厅里至今还有一把当年

他亲手做的小椅子。而今椅子犹在，木工工具还在墙上见证着曾经的岁月，历史的诡谲和荒诞，何先生却已不在。消息传来的当天中午，我在手机上写下这副不合平仄的挽联：

别了临潼，少年青年，从延安一路走来，反思有泪；

退居京郊，党史国史，到暮年两手作文，铁面无私。

这几天，又陆续读到一些挽联，众多的挽联中，王玉成先生的这副简明而意味深长：

忧国忧民忧天下；何去何从向何方。

路在何方？其实，历史的斑斑血迹早已昭示我们往何方去，何方先生在最后十八年完成的这些著作也提醒我们路在何方。世上不再有何方，但他留下的有重量的著作不会随风逝去。“何方之问”的答案也将在大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得到确切的回答。我写此文时，正值10月10日，何方先生在民国纪年之下生活了二十七年，他正是民国走过来的少年、青年。愿他的灵魂安息。■

2017年10月10日

【追思】

回忆何方先生

朱 正



10月3日，得到了何方先生去世的噩耗，很觉悲哀，想起和他交往的许多事情。

我第一次拜见何方先生是2005年5月的一天，和丁东邢小群夫妇一同去的。那天何方先生送给我两本书，是他在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的《党史笔记》上下册，副题“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我细读了一遍，觉得十分精彩，以为后世必将认为它属于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之列。许多事情，例如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担任的职务，一直都是没有说清楚

的，在这书中都有根有据地说得一清二楚了。又如延安整风，许多人都以为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写得不错，而何书就指出高书中的多处与事实不符的想象之词。我想，喝过和没有喝过延河水的毕竟不同，根据亲身经历写的和查考文献资料写的毕竟不同。

我在他这部书里也发现了一处疏忽。这恰巧同我的书有关系。我写的反右派斗争史引用了《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里提供的官方数字：1955年的肃反运动查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81000多人，肃错的130多万人。公刘兄在《随笔》1999年第一期上发表书评《董狐之笔》，评论我这本书，其中介绍了甚至引用的这个材料。何方先生在书中谈到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从公刘兄的书评中转引了这个材料，书中说：“据统计，从建国到1957年反右前，全国肃反中肃对的81000多人，肃错的（大多杀掉）竟达130多万人。”这里的叙述不很清楚。这两个数字不是“据统计”，而是《人民日报》在社论里正式发表的官方数字。而且这也不是“从建国到1957年反右前，全国肃反中”的总数（那个总数必定更要大得多），而仅仅是1955年那一场肃反运动的数字。再说，1955年那一场肃反运动虽然错案不少，可是杀人并不多，说“肃错的（大多杀掉）”就与事实不符。我把这些意思写信告诉他。他在2005年6月4日回信说：

关于肃反错杀人，我主要指解放后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举的那次肃反运动，杀人当以百万计。例如我抗战后工作过的辽阳，一县就杀掉三千人，包括给国民党当过兵的，一些倾向于我们的维持会长之类，更不用说“还乡团”、“红眼队”了。一九五五年那次肃反，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和清理中层，倒是杀人不多。遗憾的是，我丢失了一些材料，只翻了您的书和公刘评论，行文又没说清，却又注了出处为公刘。这是一个大错，易被人抓辫子，如有再版机会，一定改过来。

当然，这对于一部七十多万字谨严的书来说不过是白璧微瑕。他日此书重印（以后必定会要重印的），此处地方就得按照这封信里说的作一点技术处理，因为这是作者明白表示过的意思。

2007年11月，我得到了他送我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香港明

报出版社出版。从这里，我才知道他的经历。他是陕西省临潼县（1997年改为西安市的一个区）人，原名李彦贤，出身农家，父母都是文盲。1938年上中学的时候步行到延安参加了共产党，改名何方。整风运动中被抢救成为特务，整了两三年。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到东北工作。他做辽东省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时候，被省委书记张闻天看中。1951年张闻天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就担任了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帮张闻天写报告。1955年张闻天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他就担任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打出了一个彭黄张周集团，他就成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折腾了二十年。1979年8月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日本研究所所长，才以全部精力从事学术工作了。马克思说的，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何方在受到折腾的漫长岁月里不断在思考，难怪有这样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就跟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炼出了火眼金睛一般。

2013年6月，何方先生又将新著《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送给了我，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之一。他曾经长期在驻外使馆和外交部工作，还担任过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际问题的研究是他的本行。书中深刻地论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了。书中《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一篇，作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赏。

何方先生不但寄自己的著作给我，我收藏的那一部《张闻天文集》就是他送给我的。2013年6月20日宋以敏夫人把这部书寄来，附信说“知道这套书对您可能有参考价值，自当寄上。何方忝为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常务组员，这次得了20套张闻天集再版本。”同时寄来的还有《张闻天年谱》上下册、《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所以她说是“一套书”。这确是我必备的书籍。宋以敏夫人的信中还告诉我：

何方仍在写共和国成立头30年外交反思，只是进展甚慢。近日杨继绳约他写朝鲜战争反思文，成为一种动力，一旦成文，将用电邮发上，请您指正。

不久，何方先生就将他新写的这篇《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年祭》的打印稿寄给我征求意见了，我读了，十分佩服，觉得对我深有启发，我对其中每一个论点都深表赞同，当然就

没有能够贡献修改的意见。我在复信中说：

大文我是十分喜欢。不过设想起来，《炎黄》恐怕也难以完全按原样刊出，多半他们会来请您作一点技术性处理之后再行刊出。那么我保存的这份原稿就更加珍贵了。

何方先生的这篇文章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上以《抗美援朝的得与失》为题发表。我对照打印件看了一遍。还好，只不过磨平了一点锋芒，主要内容还是完好的。

我也将自己出的书寄给何方先生请教。2007年我寄去了《重读鲁迅》一书，12月4日他的回信虽然表示“我对鲁迅毫无研究”，但是还是提出了很精彩的意见。信中说：

我以为，对鲁迅，广而言之对一切历史人物，都应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个激烈动荡的时代，鲁迅产生一些不必保留的思想带有必然性。这个时代，我指的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期（两次世界大战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等等），人们都想改变世界、寻找出路。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绝大多数还是向往社会主义。罗素、萨特、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就都认同社会主义。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在西北欧的成功。他们称苏联道路为暴力社会主义（我看称专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最后走向了失败。中国当时受内外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容易接受暴力革命，“以俄为师”，而很难接受缓慢改良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正是由于具有左翼思想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参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掀起了一个深度和广度都达到空前程度的全民救亡运动，也是全民觉醒的启蒙运动。其影响之大，不仅促成了抗战，而且经过抗战使中华民族得以最后形成，鲁迅在这其中起了巨大作用。他不仅自己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他也影响了广大的知识青年。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还不是读了点左翼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而参加救亡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无论是鲁迅还是受他影响的人们，在当时都是真诚的。他当时受到局限和后来中国走错路，这不能由他负责。有些人因此褒胡适贬鲁迅我以为是违背历史主义的。当然，贬胡适也是错误的。他们两人都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都有功于国家民族。

我们知道，鲁迅写了许多很好的文章，这是必将永远保留下去的；晚年他也写了几篇

很成问题的文章，这是他当时所谓进步的时代潮流误导，这些就没有必要保留下去了。而在鲁迅当时，鲁迅接受这种误导却是不可避免的。同鲁迅有直接间接关系的萧伯纳、罗曼·罗兰不也是这样吗？在这封信中，何方认为，“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个激烈动荡的时代，鲁迅产生一些不必保留的思想带有必然性。”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必认为这是鲁迅受到了局限而为他惋惜。

鲁迅从他出现在文坛开始，就有不少崇拜者和追随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有不少粉丝。许多人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成为大大小小的革命家。他们，特别是其中的大革命家，后来所起的作用却不都是正确的。何方在谈到这个现象的时候，说：“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还不是读了点左翼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而参加救亡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无论是鲁迅还是受他影响的人们，在当时都是真诚的。他当时受到局限和后来中国走错路，这不能由他负责。”

因为出现了上面所说的情况，现在有人认为处于对立立场的胡适是正确的，鲁迅错了，何方不同意这种态度，他说：“褒胡适贬鲁迅我以为是违背历史主义的。当然，贬胡适也是错误的。他们两人都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都有功于国家民族。”我以为，何方的这封信是以鲁迅为例，告诉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观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2016年我在葛剑雄教授主编“当代学人精品丛书”里出版了一本“朱正卷”，内容是我阅读沈志华教授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的笔记，其中有关于中苏关系、朝鲜战争、匈牙利事件、肃反运动、大跃进等等内容，出版之后我就寄了一本向何方先生请教。可惜这时他已经在病中，住到医院里了。我竟没有能够得到他的意见。

2016年10月18日、是何方先生最后一个生日，这天他签名送给我一本书《历史要真实》

（征求意见稿），我想了一下：为什么是“征求意见稿”呢？我想，恐怕是一时还没有联系好接受它的出版社，先自费少量印制公之于友朋吧。这本书的内容包括“刘英同志跟我谈党史”、“曾彦修同志跟我谈史”、“本人的体验和认识”以及“学术自传和友人座谈”几个部分，真是充满着独家资料和独到见解，有见识的出版家应该是乐意出版它的。现在到了出版《何方全集》或者《何方文集》的时候了，但愿会有人开始做这件事了吧。■

【追思】

泪别又一个时代的猛士

——杜导正忆何方

杜明明

10月3日凌晨，何方在睡中醒来，突然喘不上气，呼吸十分困难。等到救护车来了，家人护送他到最近的地坛医院后，就再没有醒来。

遗体告别，天都哭了



10月8日，北京知识界约四百余人，在协和医院告别这位可敬可爱的党内改革派的大知识分子，人们自发来了，出乎意料的多，像潮水一样，从外科楼的一层，电梯间，医院走廊，一直到协和医院大楼外的马路上，凛冽的寒风舞动着苍苍白发和黑衣，楼下几十平方米的告别室更是挤得水泄不通，热得穿了厚衣服的人们满头是汗。

当何方儿子何宁让我们到地下室优先告别何方时，见到资中筠老师挤在排队的人群中，她从人群中过来跟坐着轮椅的父亲握手，没想到人实在太拥挤了，她踩到后面的人，幸好在王彦君协助，没有发生践踏。人群中有很多《炎黄春秋》的老朋友：胡德平、胡冀燕、张千帆、陶世龙、章立凡、盛平、李欲晓、马波等。

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历届同事今天几乎都聚集在一起。我见到胡德平、吴思、李晨、丁东等，社科院的公众知识分子章诒和、雷颐等也来了。人们簇拥着这位以自己独到经历和独到见解诠释修正党史的长者，目送他最后心愿的实现——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这捐献在老干部中算是一个表率，一般人都不易做到。

何方突然逝世，令人感伤，父亲天天念叨，他说“十天前我们三老相聚，还那么开心，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天何方满面红光，走路也比前几个月我去他家看时好，他还正在赶写最后一本书，有关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史”。

是啊，何方的著作等身，但他是比一般人付出的多得多，因他是张闻天助手，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下放，直到1978年平反，整整耽误20年，平反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和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他在外交和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有些重要见解，被当局采纳。不过，父亲认识他，却是在他七十多岁改行去研究党史，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之后。

那是二十世纪初，他以张闻天夫人刘英（长征时的中共部长）极为珍贵稿子口述，加上自己的调研和缜密科学的分析，揭示了若干重大党史的真相，在党史界引起震动。记得何方的稿子一来，父亲经常把饭碗推到一边，马上拿起来看。今年七月，病中的父亲一口气看完何方送来的《党史真相》（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一书。何方谦虚，说标题太大了。父亲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今日忍不住粗读了两遍。有深远见解，又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有根据，文字美而且此著竟那么细致、有序。盼望他多活若干年。对民族大有利。”

从遗体告别出来天就开始下起了小雨，雨渐渐大了，到傍晚竟是大雨。

父亲一整天都拄着何方送他的拐杖。他对我说，去年母亲突然去世，何方拄着这根拐杖来到母亲的灵堂，他早前摔了一跤，把腰椎摔坏了，站都站不稳的，爸爸不让他来，因为我家是三十年前的老房子要走楼梯，可是，他说非要来不可，当日只见几个人扶着他东倒西歪的来了，大家赶忙架着他，走上去。何方带来的温暖，让爸爸感动，爸爸说“我必须坚强，必须顶住，才能对得起老朋友们啊！”

十天前，三老相聚

九月二十一日为赶回北京，因为何方夫人宋以敏老师不断催促为安排三老（李锐、何方、杜导正）聚餐，还强调说何方不怕花钱，要吃好一些。父亲说，李锐已经一百零一

岁了，最好离李锐家近些，但是李夫人张玉珍说，他家附近没有什么餐厅。几经商榷，我们定在了离李锐和杜导正的家都最近的地方——龙水山饭店。

九月二十三日，三老终于相聚龙水山。那天，何方神采奕奕，非常高兴，不断地开玩笑，他用浓重的陕西话说：“人家不请我们，我们自己请自己”。父亲说：“下次我请客，再下次李锐请”。我还说“等何老一百岁时，我们也到这里来聚首”。那天点了小米海参，多宝鱼，炖豆腐，大包子，大家边吃边聊，非常开心。

那天，何方还特意坐到李锐夫人身边，他说：“咱们是老乡，一定要多照几张相”。张玉珍阿姨回忆说：“过去何方比较内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地亲热和幽默”。我想也许是第一次三老相约自己请客，而不是像过去二十年那样，总有沉重的主题，因为每次聚会，大多数是《炎黄春秋》遇到大麻烦时。如需他发言，他总是像从前杜润生说的：“杜老说的我支持”。会议经常关乎《炎黄春秋》生与死，因此气氛总是压抑和严肃的。

这次聚会是三老首次聚会。李锐身体不好，又是高高龄，何方和他又是难得见面，所以这次三老聚会就显得格外隆重和稀罕。饭店比较卫生，何方、宋老师和何宁都挺满意。一开始大家坐在沙发上聊，李锐带来了他最近出版的《墨迹选》（上海远东出版社），精装宣纸的，这之前送父亲一套，这次送何方一套，何方最后几天一直在读。大家谈得尽兴，笑声不断。何方还说，他正在写最后一本书，快写完了。“能出版吗？”大家很感兴趣，何方信心十足的说“能出！”李锐念了他准备交给十九大的一封信，谈起了十九大，他每次都列席党的代表大会。他问大家：“如果这次也请我，我出席吗？”夫人张玉珍不赞成他去。父亲和何方却大声的说：“当然必须要去。”去了，谈些什么呢，三人又议论一番。何方很精神，很开心，很活跃，从这个椅子坐到另一个椅子，又坐到张玉珍身边拍了许多照片。

也许是何方这样的智者，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预感？所以才这么心急火燎地三老聚会，心急火燎的写文章？心急火燎地约会看老友们？那天，我推着何方到车场，何宁开车，父亲非要下楼也来送他到车场，何方的手在窗外挥舞了很久。遗憾的是，这是第一次竟然成

了三老的最后的一会聚会。十天后，何方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可以见到我的母亲。他特别欣赏我母亲的国画，他曾多次对我母亲说：“你的画在老同志中可是了不得的。”至今，他家的客厅还挂着母亲送他的一幅雄鹰展翅图，雄鹰展开翅膀，目光犀利无比，象征着我父母对何方的尊敬。

“拿何方送的那根！”

何方一个老中共，对党曾经忠诚无比，他曾说，他的一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整风时承认自己是特务；二是在庐山会议时为了和中央保持一致批了张闻天。作为张闻天的助手，跟随张闻天二十年而且受益匪浅的他，最终都没能再见张闻天一面，这是何方心中永远的痛，即使他因为张闻天而下放二十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复出时，他也无法哪怕丝毫减少心中的愧疚和悔恨。这也是何老退休后，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改行研究党史的内在原因。

从自己的血泪教训中走来，他做人做学问都特别强调求实，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半点不含糊。于是面对我党有意编纂的重要历史，他挺身而出写出真相，厘清了党史中的诸多重大问题。他希望帮助中共总结历史经验，避开历史犯过的错误，走得好一些。这也是他之所以获得知识界如此尊敬的原因。

今年以来，父亲经常带着一根黑色的拐杖出门，以前我给他买过几种类型的拐杖，他一直不怎么用。这根是何方送的，拐杖很实在，简洁，有力。一如何方的品格。出门前父亲又说：“拿何方送的那根！”

随着老同志的凋零，何方是父亲近十多年来往最多和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消息灵通，目光高远，有见地，有胆量，从风浪中过来的人很有定力，他帮助父亲在《炎黄春秋》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下了决心。何方家住在首都机场附近的一个小区。从我家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一提到要去何方家，我和司机都发愁。我们几乎一两个月就会不辞劳苦不怕雾霾穿

越整个北京城去探望他，尤其近几年。

今年九月初，父亲又几次要我联系宋以敏老师去看望何方。但是那半个月北京空气污浊的令人喘不过气，他还非要去不可，我没办法，只好给何方打电话，那天正好何方大儿子从国外回来，他们一家子要团聚，何方又要去医院治疗，那几天都安排的很紧，才没有去成。宋老师给我电话说：“何方下周进城来见你们吧，明明，你也约上李锐老，你就负责联系和定时间地点吧。”正是因为宋老师之托，才有了这次史无前例的三老聚会。

相识相知在《炎黄》

父亲是新闻出版口的，何方是外交口的，他们工作和人生轨迹都没有交集。他们后半生却因《炎黄春秋》交织。2000年，何方给《炎黄春秋》送来一篇稿件《遵义会议决议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稿子引起了父亲的关注。何方用亲历者刘英（张闻天夫人）的口述回忆对张闻天在我党曾任领袖做了肯定的阐述，文章的逻辑与文笔的简练，史料的凿实都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他们两人素未谋面。紧接着，何方又送来了《送刘英大姐西行》、《张闻天的民主追求与实践》、《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这些文章的分量极其不一般。据不完全统计，何方在《炎黄春秋》历年发表的文章约有三十五篇，篇篇力作。

2003年7月，《炎黄春秋》正式聘请何方为杂志社的编委。在《炎黄春秋》的编委会上，父亲与这位跟随张闻天沉浮十多年的助手、退休后重点转为研究党史的学者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父亲对何方的评价极高，说他有胆识，求真求实，个人独立研究党史成一大家。他写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厘清了一大段历史的真实情况，纠正了延安整风期间制造的两大错误观点。一个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实际上，遵义会议确立是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集体领导，这一体制至少延续了三年。另一个：延安整风是整教条主义的根源共产国际的风。何方指出，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以算历史

账的方式，批倒了以前的领导人。以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和个人崇拜。何方指出，延安整风开创的政治局面和政治运动方式，影响至少当以百年计。2015年，当父亲决定从老干部中选几个参加社委会决策的顾问时，社里就对何方有些不同意见，也许因为何方说话陕西口音实在太浓重而且不太善于演讲，一般听众只能知道个大概。面对这些疑惑，父亲说：“你们去仔细读读他的书，了解一下他的经历，你们就知道这个人多么的了不起了。”可以说他是当代的思想家、党史家、一个独立思考并有见解的大家，大家谈党史绕不过何方写的《党史笔记》。他这是研究张闻天独一无二的唯一的专家，是坚定彻底的改革派求实派实干派。

于是，2015年底，何方和李锐一样，成为了《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参与决策的顾问之一，《炎黄春秋》的大事都必须经过社委会和顾问们讨论并拍板。

被扣三顶大帽子

2016年何方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扣上三顶大帽子：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仇视毛泽东同志，全面否定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在这当时，是令人非常恐怖三条罪。记得正是在2016年5月，在一次社委会上，当时杂志社不断挨批，大家感到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周小平等堂皇登场，阶级斗争剑拔弩张，谈完大局和杂志社如何应对等问题，何方老神情肃穆地告诉大家，他遭人举报，被社科院约谈了，说他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三顶帽子都很大，很沉重，都是要丢饭碗的。大家细细地分析形势和对策，对方来势汹汹，我们是弱势，爸爸的估计是坐牢不会，杀头不会，但是会给严重处分，降低待遇等等，在座的每一个人心情都很沉重，都为何老捏着一把汗。何方说：“我的主张是绝不妥协，我会写一个回应，坚决地反驳他们。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定要捍卫真理，不怕牺牲。”

何方对遭举报并查处问题的回应和说明中说：“我的学术研究领域包含举报者涉及的

三个问题，但举报者就这三个问题给我戴的帽子，不仅并非我的观点，还有对我实行政治陷害之嫌。”

何老的这份书面回应交上去之后，这份有理有节的反击，让社科院存心整何方的人哑口无言，无从下手，于是此事不了了之。父亲得知以后欢欣异常。

父亲说，在告别遗体会上，何方的原单位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的悼词，给予他“做出贡献”这样比较公道的评价，令父亲等老同志感到意外，也稍感安慰。

何方的书由夫人继续写

何方夫人宋以敏，端庄雅致，清华肄业。何方每次来杂志社开会都由她陪同，充当何方大秘的角色。每次开编委会，她总是当场把发言工整飞快地在一张纸上写下来，递给李锐看，近年也给父亲看。她的字又大又漂亮，几乎不落掉任何重要的话，我们杂志社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当得知何方去世后的消息，我第一个反应是请宋老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给她和何宁发了微信。当日傍晚，我和父亲赶到了他家吊唁，临别时父亲题的第一幅字是：“一定要保护好宋以敏同志。”后来才题了‘纪念何方同志：唤起民众，实现宪政’。宋以敏是资中筠的清华校友，资中筠在挽词《又一棵大树倒下了》中说：“多年来，宋以敏是何方非常得力的助手和支柱。可说，何方无以敏无以终余年，更无以完成那些宝贵的传世之作。除已经刊印成书的作品外，还有最后口授，以敏为之整理的大量遗稿。”

这本书，书名最后确定为《谈谈毛泽东外交》。宋以敏说：“还有最后一篇，只能由我替他写出了。” ■

【追思】

《党史笔记》出版的前前后后

——追忆何方先生

李 昕

国庆假期，闲暇时间较多，我找出几本书放在枕边，其中就有何方先生赠我的新作《历史要真实》这是我反复翻阅过的书，但总觉得它值得一读再读，谁想到。正当我重读这部抢救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并提出作者真知灼见的著作时，忽然噩耗传来，何方先生在十月三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九十五岁。悲痛之余，不禁百感交集，浮想联翩，想到先生光明磊落，一生坚持追求真理的风骨和品格，想到他秉笔直言，凭良知著书治史的胆识与睿智。也想到他与我个人虽不密切但堪可回忆的交往，这一切都正在进入历史。我觉得，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我该留下自己的记忆和认识。

2004年秋天，我在香港三联书店担任总编辑。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余丽嫦大姐从北京打来电话给我，她说要向我介绍一个人，推荐此人的一本书。她告诉我这本书目前在内地难于安排出版，但是极有价值，有必要在香港出版。我问详情，她说作者叫何方，书名是《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孤陋寡闻如我，竟不知何方先生大名，忙问他是做什么研究的，以前写过什么著作？

余大姐介绍，何老是社科院的著名学者，以前担任过日本研究所所长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在国际和外交政策研究方面曾有过卓越建树，例如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而不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就是何方先生首先提出，在上层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最后得到中央确认的。他是延安出身的老干部，曾亲自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又曾贴身跟随张闻天工作多年，本身是一些重要党史事件的知情人和见证人，同时又是治学严谨的学者。从1999年退休以后，他开始从事中共党史研究，这本《党史笔记》就是他近几年的研究成果。

这样的作者我自然感兴趣。但研究党史，对于作者，不过是半路出家，价值有多高？我没有十分把握。不过既然是余大姐推荐，我对他还是报以期待。因为余大姐曾在香港三联编辑部任职，非常了解三联的出版定位，同时她也是学者，致力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研究，多有著述。我相信她的眼光。

于是我问余大姐要了何老的电话。带着好奇心，也带着一些疑团，我给何老拨通了电话。

与何方的第一次通话

我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他研究的创新和突破在哪里？我因为身在香港，又在三联这样偏重文史类型图书出版的机构工作，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历来关注较多。我知道在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问题的研究中，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和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都曾引起轰动，特别是前者，因好评如潮，一时洛阳纸贵，因此我首先问何老，这两本书他是否读过？

老人家的回答令我有几分吃惊。他说，正是因为这两本书，他才更加认为有必要出版自己的《党史笔记》。这两本书，在研究上都独辟蹊径，提出一些有启发的见解，是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著作。但是，高华和王若水都并非这一段政治运动的亲历者，他们的研究，有时依据并不可靠，例如有些貌似原始的材料已经被人篡改过了，因而他们据此得出的结论注定不符合事实甚至带有他们自己主观臆测成分。

拿《红太阳》来说，高华认为延安整风的目的是“肃清斯大林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认为毛泽东在当时是既然反对王明的“国际派”，自然就一定会反对并设法摆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控制。何老告诉我，以他的亲历亲见连同他所掌握的大量史料，都可以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甚至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从来没有反对过斯大林。正好相反，他在延安所感受到的，只是毛泽东对斯大林一片虔诚。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经

常性地向斯大林请示汇报，期望接受斯大林的领导，这是中苏之间当时多封往来电文都可以证明的。所以说几十年来，我们主流历史学一直认为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和中共摆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此中共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意的道路，这其实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误区，高华和王若水都是善于独立思考并有很高理论建树的学者，竟然他们也没有跳出这个误区，这是非常遗憾的。

何老说，有鉴于此，他才感到自己作为延安整风的参与者，当事人，有必要对于党史中的一些理论误区，进行正本清源的清理，以便重建信史。

老人家在电话中的一席话，立时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正像民谚所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他的三言两语，足以使人掂量出他非同寻常的分量。于是我请他尽快将整部书稿电邮给我，我要先睹为快。

书稿是一部巨著，大约六十万字，分为二十篇。各篇虽独立成章，但组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专题性、阶段性的中共党史，详尽梳理了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运动结束这将近十年的当时脉络，系统性甚强。这同时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我一把它捧在手上，就立刻被它牢牢抓住。于是放下手下一切事物，如饥似渴地将它通读。

老实说，在我以往的阅读经验中，很少有读此书稿时被震撼的感觉，称作醍醐灌顶毫不夸张，因为发现自己原本熟知的一系列党史概念和观点，竟被这本书轻而易举地瓦解和颠覆了。作者对史料可谓纯熟，他如数家珍地列举事实，条分缕析，提出诸多无可辩驳的见解，将这一段党史做了全面刷新的阐述。特别是关于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关于延安整风本身的分析和总结，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形成和发展，关于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以及对于党史编纂学的影响，本书的分析和论述严谨也雄辩，有如拨云见日，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

读罢书稿，掩卷遐思，令我非常感慨。我一向自以为熟悉理论动态，也知道理论界藏龙卧虎，但却想象不到中共党内有这样横空出世的理论家！

我对三联书店的同事，谈了自己的读后感。简单说就是八个字：“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在体制内出版的难度

书太棒了！我极想亲手将它编辑出版，尽快送达读者手中。但是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职责所系，我需要对它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通盘考虑和评估。香港三联是中资企业，受体制的约束，我知道此类著作的出版难度，连选题论证也未必能通过。虽然机构在香港，我们不必事事都和内地出版社保持一致，接受选题的尺度可以略微放宽，但是像这部全面地大尺度地突破原有党史观念框架的著作，恐怕还是过于敏感。若是出版后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误解，那么对作者，对三联都不好。

然而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好书，我也绝不能退稿，而必须设法促成它的出版。当时想到的办法是将它介绍给当地的非中资出版社机构，比如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天地图书公司、明镜出版社等等，就像我们过去遇到三联不便安排的书稿时常常做的一样。

做好这样的预案，我给何老回复电话。我特地讲到章诒和和最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最后的贵族》，设计和印制都很漂亮，发行量也很大，问他是否愿意与牛津合作。如同意我可以代为联系。

谁知何老略一沉吟，便说：“你知道，我在中共体制内呆了一辈子，现在已经八十多了，不准备离开这个体制了，希望你能在体制内帮我安排”。

电话里，我答应帮他想办法。然而事后，心里便发愁了。一本突破体制规矩的书要在体制内出版，这确实是个难题。我苦思冥想了几天，无解。忽然有一天，灵光一闪，我想到了一个出版社：利文。

利文出版社是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属下的一个较小的出版机构，过去曾比较专注地出版中国现当代历史读物。近年来出书较少，编辑部规模收缩，联合出版集团为了方便管理，将它合并到三联，变为三联附属的一个独立单位，而“利文”也成了三联的副牌。作为中资

公司的下属机构，利文当然也属于“体制内”。但是多年来由港人自行经营管理，政治色彩淡化，出书自由度较大，在社会上、读者中，并未给人留下所谓“体制”的印象。由他们出版《党史笔记》，应该不至于引起舆论的误解。

打定主意以后，我打电话与何老商量。他不知道利文，但他相信三联。他对我说：“既是三联系统内的出版社，他放心。他唯一的条件是不删不改，保持原貌。”我对此做出了承诺。

几天后，我将书稿交给利文的总经理钟洁雄和责任编辑危丁明，这两个都有很深的人文情结，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选题，立即开始编辑工作。当时，危丁明正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听课，每月都有一两次乘飞机往返香港和北京之间。但他深知此书的重要性，在不耽误《党史笔记》的出版周期的前提下，还做了细致的案头工作，帮助何老核查了不少文献资料，而对于正文的论述，则坚持绝对不删，一字不改。最终这部著作于2005年夏天出版，堪称质量上乘，何老十分满意。

《党史笔记》面世以来，不出我的预料，它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引起强烈震动，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从此，有关如何评价张闻天、延安整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等学术界长期争论不断、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和符合逻辑的阐释，即使这个阐释仍然是一家之言，也已然赢得了众多读者的信服。有学者说，《党史笔记》是一个里程碑，这部著作出版以后，后人著述党史，便不可能绕过它了。而何老的挚友，与他一起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老一代作家、出版社家曾彦修，对《党史笔记》的评价，竟然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对张闻天歉疚下的作品

《党史笔记》一鸣惊人，人皆以为，非厚积薄发者不能为也。然而，在本书的末尾，何老却谦虚地说自己“耄耋之年初学党史”，对此，夫人宋以敏大姐解释说，何老虽然以

前没有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但是他对中共党史的反思，是从1960年他受张闻天牵连下放劳动时开始的。这表明他其实是先知先觉者。

至于他在退休后动笔写这部著作，那是基于他对张闻天深厚情感。他为张闻天做了十年助手，对其了解之深，几乎无人能及。然而他对张闻天也有歉疚，1959年“彭黄张周”（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时，他迫于政治压力，也曾违心地“揭发批判”过张，此事令他半生愧疚不已。待到张闻天获得平反以后，他发现理论界对其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仍未做出公正的评价，许多重大问题似乎讳莫如深，于是他决定秉笔直书，把自己对于张闻天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下来。因此他从1979年开始，对张闻天夫人，曾经在遵义会议以后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相当于政治局秘书）的刘英做过上百次访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于是他抱着赎罪和补过的心情，从研究张闻天入手，写下这部皇皇巨著。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反思自己作为革命者的一生。他十五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在延安进过“抗大”，经历过“整风”，曾经被“抢救”；解放后跟随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研究对外政策，成为国际问题专家。期间也因张闻天而挨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下放劳改。在研究党史的同时，何老对于自己的这些坎坷的经历，也进行了全面回顾和自我分析解剖。后来，在学者丁东和邢小群的协助下，他将自己的回忆口述录音后整理成文，又在香港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这本书可以算是《党史笔记》的副产品。

2005年春节过后，我从香港奉调回京，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任职。何老得知消息，便和夫人宋大姐一起到到三联来看我。我们相见，畅谈甚欢。我知何老继续党史研究，便表示希望继续为他做编辑和出版一点什么。何老很高兴。过了一段时间，他寄来了香港版《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意思是请我考虑能否出一个内地版？我读了书，感觉出版是可以的，但是它属于管理层规定的“重大题材”，需要送审“备案”。以我的经验估计，“备案”时专家提出修改意见，恐怕会使书稿“伤筋动骨”，这样“削足适履”

的结果，一定是何老难于接受的，也是我劝他不要在内地出了。

我提出这样的意见，其实是有参照的：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在三联策划的一套回忆录。它的作者正是何老的挚友，老一代出版家曾彦修。曾老也是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亲历者，也曾任在张闻天身边工作过，1957年为保护同事不受打击，自己挺身而出当了右派，改革开放后获得平反，在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又因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与胡乔木意见相左而辞职。他一辈子凭良心做事，宁可自己挨整也不整人，所写的回忆录，题目就叫《微觉此生未整人》。交稿后，我也曾预感，如果此书在内地出版，将会被大删大砍，不如到香港去出。曾老起初不同意，认为香港出版，内地读者读不到，没意思。他还是想在内地试试。可是书稿交给内地一家出版社后，按例送审，竟然几年没有回复，如石沉大海。后来曾老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此书的香港版。

何老这本回忆录，如果去“备案”，我估计情况也差不多。后来我听说，内地有一间出版社表示愿意尝试，于是他们将书稿送交中央某部门，请专家审稿。我因为过去经常处理此类“重大选题”，与一些审稿专家颇熟悉。恰好一次遇到一位曾经担任过中央部门领导审稿专家，这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学友，他告诉我，何老这本书曾经经他的手做过审读，他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写了，“拟同意出版”的意见，为了避免敏感，还考虑将书名改名为《从延安一路走来》，删去了“反思”二字。但是负责签字和盖章的领导一直没有给予批复，所以这本书虽有专家的肯定的意见也不算数，最终不能出。

《何方谈史忆人》

当然何老还有其他著作，我曾和他谈起，三联可以为他出版学术随笔集。于是他电邮发来一部书稿，总共大约十篇长文，清一色都是关于张闻天的，有回忆，有感想，有评论。他附一封信给我，希望我给他出版方面的建议。我觉得此稿属于政治家传记和研究类，似乎不太符合偏重编辑政治读物的出版定位，而更加适合侧重编辑政治读物的出版社，所以

我建议他选择其它出版单位，如果他不熟悉，我可以帮他介绍。老先生同意让我代为联系。先在北京找了一家政治读物出版大社，问他们是否感兴趣，他们回函表示，这种书可能亏损，没有资助难于安排。我于是又找到某省的一家“人民出版社”他们的社长表示，这类书要送审，出版很麻烦，算了吧。我很沮丧，将情况向何老报告，但他说没关系。

然而大约一年以后，我忽然看到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为本题为《何方谈史忆人》的畅销书大作宣传。找来此书一看，发现它的内容，竟然是以前我看过的回忆和评论张闻天的十来篇文章为主体，后面又加入了何老关于一些文化人的随笔，包括对李一氓、宦乡、李慎之、陈乐民等人的书的腰封上，赫然印着余英时、李泽厚、丁东、资中筠等八位文化学者联袂推荐，可谓隆重其事。直到这时，我才猛地发现，如此“谈史忆人”的书其实十分适合三联的风格。怪我当初脑筋死板缺乏灵活性，策划意识不足，加之与老人交流不够，致使三联和一本好书失之交臂。这真令我懊悔不已。

“编这样的一本书，就不枉此生”

后来，在一次聚会上，我见到曾为何老整理口述回忆的丁东和邢小群。我对他们谈起自己未能出版《何方谈史忆人》的遗憾。我说这纯粹是一念之差，却让我一直对何老心怀歉疚。丁东安慰我说，你理应知足了。好书怎能都落到你一个人手里？《党史笔记》奠定了何方党史专家的地位，这该让你欣慰。他强调说，“我认为一个人当一辈子编辑，编这样一本书，就不枉此生”。

细想，他说的话有道理。

不过何老并没有嗔怪我。每有新著，他照样寄给我，还以工整的书法写上“请指正”等字样。今年一月，三联的同事罗少强去拜访他，他又请少强给我带来一册自印本著作，题为《历史要真实》（征求意见稿）。书的主要内容分三部分，即与刘英、曾彦修谈党史和他本人对党史的认识，仍然是他长期以来为了撰写《党史笔记》所积累的史料和思考。

这本书可谓何老的谢幕之作，从中读者会发现，让这位时年九十五岁的老人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为中共党史建立信史，写出良史。所以他才会给本书取名《历史要真实》，这是他留给世界的遗言。

如今，老人驾鹤西去，我抚摸着他的著作，追思往事，提笔写下一副挽联：

直言著述，无私无畏，信史雄文惊天下；

追求真理，大彻大悟，胆识睿智启后人。

何方先生千古 李昕敬挽 ■

【追思】

他当然是值得纪念的

周 实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何方先生去世了。

看到更多人写了挽联纪念他。他当然是值得纪念的。我和他虽然未见过面，但和他通过信，也通过电话。他的党史笔记第一篇就投给了《书屋》，遗憾的是没发出来。

遗憾的事总是很多。

比如 2001 年 4 月他给了我一篇稿子，关于“延安抢救运动”的。我已编好准备发了，却在六月份调离了。下面是他投稿时写给我的那封信：

周实同志：

日前寄上一篇《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想已收到。原拟借《书屋》一角发表，不想被北京几个刊物抢去（曾彦修让《炎黄春秋》发表，中央党校研究室的同志又交《百年潮》刊用，有人还推荐给《人物》。其实我只是请老曾、金冲及等同志阅提意见）。经协商，最后决定《百年潮》五月份刊出。这样，就太对不起《书屋》了。因此

特函请罪，尚祈海涵。

看到三月份《书屋》上李锐一篇文章，把延安抢救运动的发起和执行完全推给康生。对这一普遍说法，我历来有不同意见。因为我也是亲历抢救者之一（李锐早被关押，反而不大了解），正要写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所以那天即打电话给李普请他转告李锐，我要进行一点辩论。正好在去年所写的材料中，找到一份未发表过的短篇，特送审定，是否适用，望告一声。

即祝

编安！

何 方 四月二日

信尾，他还补了一句：“你们的电子邮件，不知何故，都没发出，只好写信邮寄。”

确实，那段时间的电子邮件，总是这样“不知何故”。而之前，他电邮的几个稿子也同样不知消失在“何方”。

“似已遗失在空中”了，他这样回答我，在他邮寄的信中。■

【追思】

访问“世纪和平老人”何方

王德禄 刘志光

作者题记：2017年10月4日惊闻何方先生逝世。在十一假日期间，我们各自从青岛和秦皇岛回到北京。10月8日上午我们到协和医院送别何方先生，并送了挽辞：改革开放立足和平时代，社会发展基于历史真相。何方先生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也是中国和平

发展战略的推动者和见证人。他对胡耀邦在和平发展问题上的思考 and 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在某种程度上讲，对和平发展时代的判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原则”。80年代我们研究和平运动与和平文化，与何方先生的研究和主张相一致。以下记载了我们2014年2月5日去何方先生家访问的内容。现提供给各位，也算是对这位“世纪和平老人”的追思与怀念吧！

2014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上午我们和程宏在姚监复的陪同下驱车去顺义拜访一位“世纪和平老人”何方。之所以要拜访何方，是源自内心的一个情结。在上世纪80年代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和平问题，而且是作为独立研究者在思考人类和平的希望。最近几年，老是听说何方在和平与外交政策方面做过很多工作，随着他将张闻天当年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披露出来，何方本人在和平研究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近年，我们把“两头真”的老人叫做“世纪老人”，何方显然是一位“世纪老人”，更是一位“世纪和平老人”。

何方住在位于万科花园的一幢普通住宅楼，何方和他夫人宋以敏接待了我们。何方今年92岁了，虽然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头脑清楚，思维很敏捷，语言交流能力很好。何方客厅书橱里有很多他自己的著作，展示了何方先生笔耕不辍的思想成果。电视柜上摆放着他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彰显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墙上挂了几幅字画，其中一幅为“仁者寿”，与何方先生的为人处事风格很吻合，也象征着和平研究成果在他身上的体现。

一、谈话，从和平研究开始

坐定后，王德禄首先向何方谈起了和平问题研究经历。他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传记。因为奥本海默反对使用原子弹，这段历史很吸引人。大学毕业后，王德禄专门研究科学家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运动，进而研究“核和平”问题。我的研究是基于良知和对和平的渴望，与官方没有关系。官方在1986年世界和平年筹备召开和平研

究学术会议，由于国内和平研究者较少，科学院把他调入北京，为这次会议准备稿件。为此，还专门还拜见过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何方听后把王德禄夸奖了一番。

王德禄说：我最近才知道你在研究和平方面的贡献。何方说：我在和平问题的研究上是有些不同看法的，我的观点主要是，二战以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不可能再发生世界大战与大国之间的战争，只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因为世界已从上半世纪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进入二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

何方后来又谈了他的主要看法，20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两个时代。头半期是战争与革命时代，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民族民主革命（延续到下半期）推倒了殖民主义体系，一百多个国家获得独立。后半期就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了。

何方说，我们在建国后头30年一直以备战为国策，还时刻准备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就是因为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一重要变化，认为世界总是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从而耽误了二战后世界发展的一段黄金时代，造成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国家受到巨大损失，人民遭遇严重苦难。

二、日本的对外侵略属于民族犯罪

王德禄向何方提问日本人为什么不断折腾？何方对此先讲了两点日本所处的环境：一是日本属于单一民族，二是岛国意识。日本至今不认为他们是民族犯罪。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如毛泽东也认为日本的二战罪行只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犯下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开脱了日本的民族犯罪。而德国在二战后全民族都认识到在希特勒的对外侵略中，整个德意志民族也有一定责任。日本则相反，从统治集团起，连对外侵略都不痛快承认，更谈不上民族犯罪了。照马克思的说法，统治集团的意识就成了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

为什么二战后德国人老老实实，日本人大多不太老实呢？就是因为德国人民认识到并且承担起民族犯罪的责任，所以战败后领土被割去了三分之一，他们也不闹腾。日本固有

领土根本未动，只是归还了侵略夺取的外国领土，但却和所有邻国闹领土问题，要中国钓鱼岛、韩国的独岛、俄国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

王德禄征求何方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宋以敏说：在研究和平问题特别是中日关系方面，多数有名望的、有水平的人都谢世了，现在何方一类存世的人也都边缘化了。现在在中日关系方面，军方的话语权更大，甚至超过外交部的声音。

三、中国和平与发展国策的历史演进

何方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为了让他休息一下，我们开始请宋以敏谈谈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国策问题。

刘志光说：看到宋老师在《炎黄春秋》发表了《胡耀邦在外交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的文章。宋以敏回答说：我长期在外交部新闻司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做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工作，但从未涉足理论和党史研究领域。离休后为何方的写作做一点辅助工作，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其中有关时代问题的论述接受了何方的观点。

宋以敏介绍：胡耀邦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是从否定毛泽东“一条线”战略开始的，在这一点上胡耀邦走在了邓小平的前面。过程是这样的——文革刚结束时，邓小平完全坚持毛泽东那一套，还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苏联是战争主要策源地，我国的主要敌人。而胡耀邦明确指出，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不合实际。他还努力扭转对苏联的敌视态度。胡耀邦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倡全世界加强合作和交流，提出用发展代替革命。

1984年开始邓小平提出冷静地判断世界形势，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也在这个时候，邓小平采纳了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外援数量从占财政支出最高的7%减少到1%。这是了不得的变化，中国从这个时候开始开放，开始融入世界。

何方1980年代中期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了。这个观点受到了陈云的批评，邓力群还组织会议进行讨论和批判。何方认为，建国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实际上存在

着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主张的革命外交，另外一条是张闻天提出的和平共处外交。两条路线的分歧，关键在于中国革命成功了以后，外交到底是为什么服务？是为世界革命服务，还是为国家建设服务。

刘志光说：我和王德禄是大学同学，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平问题，我在80年代写过一本书叫《东方和平主义》，就是想对中国文化做个界定，王德禄研究的是原子弹社会史，后来研究科技史和核和平。我们在美国见过傅高义，最近在长城所召开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座谈会”上有人阐述时代问题，提到何方、李一氓的和平思想在80年代受到左派的攻击，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李一氓是“拨乱反正”的先驱，他在文革当中就能抓住关键问题提一些看法，比如他认为：三个世界的划分不是客观世界的划分而是主观世界的划分。80年代，邓小平当曾面抱怨：“你这个李一氓呀！”

王德禄在《邓小平时代》座谈会的发言中提出：邓小平时代的核心是胡耀邦、邓小平对世界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新技术革命是时代的方向。据何方介绍，张闻天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尽管张闻天当时没有明确分析《帝国主义论》过时，但是他看到世界大势已经完全变了，这就已经接近对时代特征的看法。在毛泽东时代，张闻天能够提出外交政策的方针就是和平共处，已经很不简单了。

何方认为胡耀邦的和平发展思想，是清醒的，是独立思考过的。胡耀邦的和平发展想法究竟从何而来？是受谁的影响？胡有他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感受在里头，但是和张闻天的思想相通。

在与何方讨论后，我们感到以和平与发展取代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战略的第一原则，没有这个原则，一切无从谈起。■

2017-10

【追思】

最后一次见何方先生

崔卫平



2010年4月，我有幸搬到与何方先生住在同一个小区。因为电话不便，因此也不打招呼，抬脚就到，聆听他的教诲比较多，比较了解他晚年关心的问题。与他交往的许多事情以后再写，先记下最后一次见他老人家。应该在今年（2017年）3月25日左右，这回我要远行了。其实心里想到了也许这是最后一面，但是表面上不该露出来。临告别时，眼泪和在眼里不敢掉下来。因此回家之后，用笔记下了这次见面所谈内容。

那是下午，我去时老人家正在阳台上晒太阳，何老的太太宋老师在那里给他布置了一个很舒服的小窝，椅子虽旧，但是铺得十分柔软。他属于那种时时处于状态之中的人，一开口总是有“货”。“这辈子印象最深的就是饿”，不知道话题一下子到了这里。“饿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回放工之后在镰刀上睡着了，睡了一夜，因为饿得没有力气再起来。”

“有一个讨饭出身的贫农老大娘曾经问我，毛主席的心怎么就那么狠，就是不让我们老百姓吃饱饭？当时没有回答，现在有了答案——毛泽东从来不把人当人。斯大林、毛泽东搞的都是这套。马克思没有参加实际的政权，列宁除了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坏了，把我专政到了江西9年。”

接下来他讲在江西养猪的故事，这个故事听过好几回了。他在干校养了一年多猪，猪养得很好，能训练小猪听得懂“小猪出去——”、“小猪回来——”。人们感到很惊讶，前来参观，他幼小的儿子来干校看他，他也让儿子看他养的听话的猪，孩子感到很惊奇。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想让它听话，给它吃就行了”。接下来我也跟着说，1969年随父母下放时，我也养猪，喜欢小猪，下次我们来开个研讨会，专门交流养猪心得。

老人家说，他主要是“火头军”，别的不会干，主要就是“烧火”。养猪要烧猪食。一边烧火，一边看书，因此重看也新看了许多书，包括《资本论》、《剩余价值论》，也包括竺可桢的物候学，论气候与粮食的关系等。这让我想起他在回忆录《从延安一路走过来的反思——何方自述》里写过他背得上所有《红楼梦》里的诗词。这是他在延安挑大粪的时候，一边肩上压着担子，一边拿着一本《红楼梦》，还爬坡，那时候背上的。

何老提到了一本《玉匣记》的书，他当时也看了，他是什么书都看。《玉匣记》是一本算命的书，他也照着给人家掐算日子什么的。估计这个故事他许多年前不敢讲，那属于封建迷信。有一年他去美国休斯敦作学术访问时见到了何太太的一位舅母（从台湾去的），在她面前大谈《易经》和算卦。这位老太太听了很佩服，说你这么大的本事，参加共产党可惜了。说到这里他不说话了。我追了一句，您怎么看这句话？他哈哈一笑。

宋老师问我远行研究什么？我说，还是我自己常年关心的课题，极权主义。何老摆摆手，“极权主义不要研究，太简单了，不过你不知道，你没有经历过”。我说到极权主义与官僚主义不一样，文化大革命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反对官僚主义，结果导致了进一步的极权主义。老先生头脑敏捷，马上说：“当然不一样。极权主义干事情，官僚主义不干事情。”

我说“何老您这辈子值了”。虽然经历了许多辛苦——去延安抗日却被“抓特务”、去年还被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函询”了，有一个光荣的起点，也有一个光荣的终点，然后将它们写了出来，还什么也没耽误——《红楼梦》、《玉匣记》也看得不少。

老人家仰头笑了起来。

因为我的远行，老先生给我录了一幅字，诸葛亮的《诫子书》，何老并写道：“卫平远行，特录此以赠。既留作纪念，又可供我们用作传承中国文化之一份资料。”

《诫子书》如下：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愁守穷庐，将复何及！■

【追思】

经历迷失的何方，晚年终以董狐之笔直面历史

凤凰网主笔 张 弘

10月3日，何方先生仙逝，学界老中青三代为之哀悼纪念。自此，外交学界少了一个见识卓越的前辈先贤，党史学界少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何方先生1922年出生，1938年即进入延安，投身革命。1949年，他被张闻天看中而成为其助手，由此大半生厕身于高级知识分子之列。1950年入外交部，任驻苏联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在张闻天指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及有关工作。1959年，张闻天因庐山会议受到批判，何方先生迫于压力，在反右倾运动中揭发了张闻天。但他并未因此逃过此劫，仍于1960年被下放到安徽省六安县苏家埠人民公社苏北大队。1961年回到北京后，1965年春又下放到河北搞“四清”。

1966年被外交部党委作为“牛鬼蛇神”抛出，交由“群众”批斗和监督劳动，1969年3月被押送五七干校，作为群众专政对象，继续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1972年，何方被开除党籍，直到1978年，才自行离开干校回到北京。1979年平反后，他离开外交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0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99年离休。

作为中共高干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晚年的何方先生受到学界的普遍尊重。人们把他和李锐、李慎之这样的老人称为“两头真”。意思是早年身负理想与信念，一腔真忱投入革命，中年被权力和意识形态塑造、驯化，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和牺牲品。晚年之后痛定思痛，回归自我，对以往的历程做出了真切反思。但是，在我看来，至少在何方先生身上，只有晚年的一头真。他的早年和中年，更准确的描述是迷失。

以真的本意来说，至少包括真实的表达而不做违心之论，独立的思考而不是一味的盲从，能够以自己的识见做出价值判断并据此展开行动，而不是空有一腔抱负；有为人处世的底线和原则而不是无条件服从意识形态。何方先生晚年回归自我，无论是外交史研究，

张闻天研究，还是党史研究，都体现了求真的勇气和态度。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补充和完整了高华教授的延安整风研究；他以宏大视野和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检讨我国外交政策的得失，并披露周恩来、陈毅的外交真相；他以个人良知和道德勇气，客观论述毛泽东、张闻天、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作为；他以过来人的痛定思痛，反省个人崇拜，提倡民主。

何方先生曾一再说，“我这一生中犯过两大政治错误，一个是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个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这就一直是我的思想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这两次烙在灵魂深处的耻辱，前者发生于他20岁的时候，因为在抢救运动中被围攻、熬鹰，他一时扛不住压力，屈打成招，过后又反悔；后者发生于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期间，37岁他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被迫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之间选择。

因为何方崇拜毛泽东，相信毛泽东和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因而选择了揭发张闻天。这两件让他耿耿于怀的错事，一个发生于青年时代，一个发生于中年时代，两者的发生逻辑和内在机理基本一致：激烈和没有中间道路的政治运动让人们不得不选择非此即彼的“站队”，在组织的强大压力之下，个人没有能力辨识真相，并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不得不做违心之论。

事情发生之后，何方先生又一直为之懊悔不已，视之为个人人生经历中的污点。因此，从他精神人格的成长和发育来看，他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均有一定程度的迷失。直到晚年，才回归自我，反省此前的功过得失。而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和饱受赞誉，恰恰是因为他的反省沉痛而真诚。由于既是经历者又是研究者，他的党史研究既有去伪存真的董狐直笔，更有过来人的经验和教训。同样是反省，无论是在格局、视野，还是在直面历史的勇气以及思想的深度上，何方先生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

前半生投身革命，迷失自我且历经坎坷；晚年反思经历过的道路，检讨功过得失。敢于承受切肤之痛的何方先生无疑值得敬重。他留下的外交著作，以及《何方自述》《何方

杂谈》《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等等著作，都是一笔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作为史料，人们能够看到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外交得失，政治运动的残酷和危害；作为思想史著作，人们更能看到一位老人洞明世事的犀利眼光，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开放宽容的政治心态，直面历史的责任担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晚年一头真的何方先生赓续了司马迁的史家传统，历经坎坷求索中国道路的他纵身一跃，完成了自己人生最壮丽的一章。■

【追思】

追忆亲爱的何方伯伯

王晓林



我与何方伯伯的交往时间很短很短，从第一次见面到半个月前最后的送别，满打满算还不到3年时间，可他留给我如父般的温馨记忆却足以伴我终生。

知道“何方”这个名字要比我见到他早得多。宋以敏阿姨和父亲同为抗战时期重庆南开中学的1948级同学，他们退休后在京不时聚会。他的书架上早早就已有了何方的“非法出版物”——《党史笔记》，与另几本同样“非法”的出版物——《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红太阳的陨落》、《萧军日记》、《中国共产党史稿（王建民版）》以及“合法出版物”——《中国共产党历史（2010版）》、《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党史札记（末篇）》赫然并立。是时我正在撰写《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亟需各种来源、立场和观点的史料来摸索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一段忌讳莫深的岁月，就把它

们都读了一遍，并由此才知道何方是大名鼎鼎张闻天的助手，另类党史专家，也是我家三代人尊重的《炎黄春秋》杂志三老之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人物。不过也仅此而已，毕竟《党史笔记》的重点涉我追究的那段岁月不多。

真正认识何伯伯，还要等到2015年。

上年秋，我用时五年写就的《顾准和他的时代》接近尾声，李锐老题写了书名，画家李斌先生专门为它画了一幅新作——《顾准·1974》：

“1974年2月12日，顾准下笔书写《希腊城邦制度》，乔治·格罗托的《希腊史》和乔治·卡特林的《政治哲学家史话》是其最重要的参考书。拖着沉疴病体，他翻译了前者‘希腊的僭主时代’一章和后者‘罗马法和教父们’一章。12月3日，顾准离世。”

那年恰是顾准逝世40周年祭年，接着的2015年又是他100周年诞辰，可偌大一个中国却无一处能对这位被西方学者称作“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界稍稍像点样子的”、被本土知识界众口一词称作“为中国读书人挣回了些许尊严”的人物作个小小的祭奠和纪念。忘却了他，这个国家、这个族群情何以堪？于是由最早探索和研究顾准的六位思想界知名学者发出了如下倡议信：

“XXX先生，您好！

今年7月1日是顾准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画家李斌先生为此创作了油画《顾准·1974》，王晓林即将出版的新书《顾准和他的时代》将首次刊用。一个没有纪念的民族如同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顾准不应该被遗忘。我们倡议以我们大家的名义将此画捐赠给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校史展览室。偌大中国，也就只有立信——顾准12岁从那里开始展露天分——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在纪念他。如果您同意这一倡议，允许将来这幅油画下方的铜牌上镌刻出您的名字，只需回复“同意”二字即可。 祝平安、健康。

2015年6月1日”

我把这一倡议信同时传给了近四十位学者，上至 110 岁高龄的老人，近 60 万字的《顾准和他的时代》假如没有他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是无法想象能写得出来的，下至 70 后年轻人，这位可畏后生，顾准死去时她还没有出生，却在 2009 年写下了《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文章，直至今天还被许多年轻人口传心记。这封倡议书得到了绝大多数收信人的回应。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学界赫赫扬扬，许多人的回信除了“同意”还写来了十分感人的文字。

何方伯伯就是回应者之一，同时附来了宋以敏阿姨亲切的招呼：“晓林，到家里来坐坐吧。”

是年爸爸的去世、过不了审查关而无法付梓的书，都令我抑郁非常，这个春天也我第一次迈进何方伯伯、宋阿姨温馨的家门。两年多来，在宋阿姨一杯杯热茶的氤氲中，在何方伯伯一回回温暖的大手里，在小赵阿姨热腾腾的饭桌上，丹桂园 105A 让我恍惚间感觉父母尤在。

2015 年 7 月香港书展，《顾准和他的时代》有幸和《李锐口述往事（新版）》同时上架。拿到新书，我立刻赶去送给李老和何老，并得知何方伯伯的《党史真相》已在同一间出版社出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立刻表示要承担把书带回北京的任务。那时我已看过了书的手稿，“良史”和“信史”这两个从书中第一次学到的名词已经深印脑海。唱着“仇恨入心要发芽”长大的我这一代，所受教育无一不是建立在“无良史”和“无信史”基础上的，从 AB 团、海陆丰、鄂豫皖、土改、半夜鸡叫、收租院、渣滓洞白公馆到镇反、反右、“自然灾害”、文革，还有那“巍峨的遵义城……捧出红日照山川”……。这些东西我辈从深信不疑到反感厌恶，却无力追究、思辨和反省。

眼下年轻人常常议论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却少有人关注这代人童年曾经受过何样教育。忆着“苦”唱着“红”攒着“仇”怀着“恨”，在鲜血和仇恨崇拜中长大的一代的，怎么可能懂得什么叫“爱”和如何去爱？！伪史和谎言令这代人失去了爱、甚至被爱的能力。眼下这样一个“互害型”社会，要想和几十年“恨的教育”切割清

楚，谈何容易。

而何伯伯要写良史、信史，且挑了一个最痛最痒最酸最犯忌的“阿是穴”——中共党史，一针扎了下去。有实证在手，老人不撒谎、不作假、不夸张、不隐恶，且，不罢手！任它面训函训，热嘲冷讽，诘南骂西，指北说东。年过九十的耄耋老人呵，悲哉！壮哉！

无论如何要把何伯伯的书带回来，亲手交到他的手中，让更多的人看到，让党史，让国人从“不说谎”做起。听不进宋阿姨的警告，记不得劳什子“函训”，许多人行动起来。

应了“得道多助”的老话，尽管过程曲折有趣，可叹可笑，可目的最终顺利达到了。更令所有敬爱这位著者的人们宽慰的是，一个国际著名的大型图书馆热情收藏了李锐老和何方老的著作，并给二老颁发了精美的收藏证书。

感谢所有的接力者们，甚至感谢海关的姑娘小伙子们。我已感受过你们的亲切和礼貌，一声声“阿姨，先坐一坐”，“别着急，喝口水”，一双双年轻眼睛里深深的无奈，足以让人看到希望。

话说回来。和二老见面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能平等对话。就算我这个工科出身的晚辈难免有冒昧、唐突、无知之处，二老从无愠色，更不会怪罪，这令我倍感亲切和留恋。两年多我们的话题不拘一格，谈历史，谈党史，谈《炎黄春秋》，谈我们共同的朋友。我曾对官方最新出版的《党史》对莫斯科中山大学一节居然一字不着大感困惑，何伯伯说忌讳莫深的又何止中大；我对《炎黄春秋》的猝死悲愤莫名，宋阿姨开导我永远不要失望，来日方长。

还有件趣事，何伯伯送给好友克明妈妈任均阿姨的书上写着“请任均同志指正 延安时期的粉丝何方”，原来任阿姨在延安有“小梅兰芳”之称，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何方成为她的粉丝很正常。我告诉伯伯，任阿姨对他这个粉丝的“奉承”乐不可支，何伯伯也乐开了花。

还有一次何伯伯兴致上来，用他的“陕普”背诵西厢记“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给我和宋阿姨听。可追悔莫及的是直到他驾鹤

西去，我才知道这是一位能把整本《红楼梦》的诗词和章目倒背如流，日内瓦会议期间朱仲丽当着周恩来的面要何方当场背诵《桃花行》，并没把何方考倒的人，而自己号称读红七八遍，却连《葬花词》都背不全……。

我总以为还会有许许多多快乐、有趣的相聚，我们有的是时间。

20多天前，9月30日，我又一次走进丹桂园那个温馨的客厅，送去最后一批《党史真相》。一连串的接力，我是最后一棒。

何伯伯还躺在卧室，宋阿姨说“晓林你进去吧。你就像我们的女儿，何伯伯不忌讳的”。个子小小的她熟练地扶起了身材魁梧的何伯伯，我都帮不上手。伯伯的腿已经有一年多不好使了。老人看到书好高兴啊，我趁机说“您得给阎长贵老人签送一本，我都答应他了”。何伯伯说“好啊好啊，我们很熟悉呀”。我们又聊了何伯伯关于国家外交政策和1949年后中国打的那四场小型战争的一本新书。其中中越一战，我谈了掌握的资料和自己的看法，并拿出我的两篇文章《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和《再探波尔布特大屠杀的教训》请二老指正。

转眼午饭时间到了，宋阿姨又要留我吃饭，我说光您的零食我就吃饱了呀，下次我带自制的武汉米粉肉来再一起吃吧。起身，我像从前每次告别一样，搂住伯伯的肩膀，在他脸颊亲了亲，再把手放在那双大手中握别。

可谁能想到这次分手，竟是永别！竟是永别！！竟是永别！！

亲爱的伯伯，您匆匆去了何方啊？

请一定告诉我，好将来找到您，能像每一次我们相聚那样，把手放在您热乎乎的大手里，搂着您宽大的肩膀，贴上您温暖的面颊，轻轻地告诉您：

“我们自己的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新的《党史》，昨天才上架。您看，我给您带来了一本，可不许着急，慢慢看呵。” ■

【追思】

悼念何方叔叔兼议道德创伤

叶维丽



我人在海外，手头有几本何方老的赠书，最近的一本是《历史要真实》（征求意见稿），扉页上题赠时间为今年（2017年）一月七号，称我为“维丽侄女”，笔迹已显颤抖。

今秋在京，本打算如过去十来年一样，去顺义探望何方叔叔和宋以敏阿姨，不料约好时间之后不到24小时，就听到何叔叔去世的消息。老人家一个个走了，以后再回北京，已无必定

要登门拜望的前辈了。

他们是我的父母辈。90年代以来，出于困惑——时代的，历史的，自身的——我开始关注这代人，做访谈、收资料，试图从中共党内“一二·九”/“三八式”、即20世纪30年代“知青”一代的角度，梳理审视中国革命的复杂遗产。在这个过程中，在我接触过的几十位老人家里，有两位令我格外敬重：一位是曾彦修，另一位就是何方，他们俩又恰为挚友。

“反思”是一些老人晚年的共同所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方实（叶笃成），他本人参与创办《炎黄春秋》杂志，为“反思”搭建了一个安全和暖心的平台。不少老人留下了文字，或回忆几件具体事，或纵观自己的一生，讲出多年来憋在心中的事，说出很多心里的话。今天去看，很庆幸在他们进入七老八十之际，赶上了一段相对宽松的时光，得以比较从容无惧地回顾审视平生经历，老了老了，居然还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个现象本身，就令人感动不已。他们给后人、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份量只会愈益增显。

我格外敬重曾彦修和何方两位，是因为在我看来，在通常被称为“两头真”的老共产党员群体中，他俩又与众不同，赫然并立。他们都是衰年开始“治学”，以老病之躯、一己之力，独辟蹊径，“自学成才”，在同代人中下力最大，用功最深，跋涉最远。前者钻研苏俄历史，后者爬梳中共党史，各自花了一二十年时间，著书立说，发人所未见，申自家之言。他们的学问，不是书斋里的，他们的问题，不是书本上的，他们不仅带着个体的生命经历，也背负着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英文有个词，叫“insider”（里面的人），曾、何自青年时代起即为中国革命的“insider”，到了晚年，他们从“里面”跳将出来，离得远了些，站得高了些，看得广了些，以“insider out”的身份审视个人走过的道路，审视国家走过的道路，也审视20世纪的“革命”，其视野，其勇气，其毅力，何其可贵；其用心，又何其良苦。

我注意到，何方叔叔决心研究党史，有一层非常重要的个人原因，即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得不参与对张闻天的揭发批判，这成为他“思想和精神上”的一大“包袱”；文革结束后再见到张闻天夫人刘英时，他当面“谢罪”，一向很少哭的他，那天竟“失去控制”。此后他就从厘清张闻天在中共历史上真实领导地位开始，一头扎进党史研究，一发而不可收拾。

前些天我看了一部美国公共电视台放的记录片，讲的是上过伊拉克战场的一些美国大兵复员回国后，内心经历着精神和道德价值的危机：他们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原来所相信尊崇的道德观念发生严重冲突，以致于他们回国后内心继续受到自我谴责而无法释怀，不能融入和平的日常生活。引起我注意的，是记录片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moral injury（姑且译做“道德创伤”），用来说明复员兵们所遭遇问题的“性质”，有别于过去惯用的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moral injury多了一层“道德”维度，注意到经历者本人“自责”的主观感受[目前在美国，moral injury这一概念主要在心理治疗界使用，对象基本上限于从战场上归来的美国士兵，尤其是近年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回来的复员军人。从第

一次大战以来，人们就开始注意战争给复员军人带来的种种非物理性创伤的影响，包括在情绪、精神、心理等层面，并冠以种种名称。直到最近，PTSD 是最常用的名称。Jonathan Shay 和 Brett Litz 是两位对 moral injury（道德创伤）现象分别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专业人士，同时，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有所不同。]。

对美国人的事情，我常抱观察态度，也关注，但冷眼时居多。moral injury 的说法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时，我想：哦，这词儿新；此后它在片中一再出现，某一刻我突然受到触动，像是被敲击了一下：我想到了自己同代的中国人，而把美国大兵放在了脑后。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文革“打老师”的我们这一代，内心深处也是有 moral injury 的呀，不知不觉中，我已泪流满面。

按下美国人的事不表，也不打算去探讨这个听起来新（实则不新）的概念之内涵与外延。这里我想说的是，moral injury 一词帮助我拎出一些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帮助我开拓了一个认识和理解问题的视角，让我得以展开联想，“借题发挥”。我不仅想到了自己这代人，也想到了我的长辈，包括我的父亲母亲。两代人身上，都带着 moral injury 啊。

我父亲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我在延安被审干》的文章（2003 年第 10 期）。他写到，“抢救运动”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并编造上级是时在大后方的哥哥叶笃正。文章发表前，那期的责编请他再加上几句话，“因为后人很难理解这种事”。几天后父亲交回了稿件。那位责编告诉我，补充的话让他感到“震惊”。父亲是这么写的：“过去我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我的亲兄弟是我的‘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

“这还算是人吗！？”——第一次读父亲这篇文章时，这句话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打在我的心上。

从小到大，一直到 80 年代，我和弟弟妹妹从未听爸爸说过他在延安“被审干”、在保安处被关了三年。这件事他在心里装了几十年。

父亲的文章写于2003年。两年后的2005年夏，88岁的他因严重中风而偏瘫失语，在倒下前好歹留下了这篇文章，留下了最后补充的那一段话。

无独有偶，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留下的材料里发现她自50年代初以来的思想检查和文革中的历史交代，其中一份提到，延安审干时，她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指认“上级”为她在后方的哥哥。我父母都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他们在抢救运动中不约而同地编造自己的亲兄弟为“特务上级”。母亲生前从未对我们提过这段经历，我永远无法知道它给她带来的影响和伤害。

在我访谈的父辈中，有黄兴的遗腹子黄乃。谈到延安审干时，他说在压力下承认自己是特务，并说当时以为承认了就会轻松，但之后却感到十分纠结和痛苦，说到此处，他把一只手放在心口，脸上显出因极疼才会有的扭曲表情。黄乃双目失明，他胸前的枯手和脸上的表情让我记到了今天。

“Moral injury”对于人类——无论是“东方人”、“西方人”、“古代人”、“现代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时时期，应该都不陌生，此中例子不胜枚举。既是当代中国人，还是要讲我们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文革结束后，曾经被视为“文艺沙皇”的周扬逢人必道歉，常常是未开口已泪水涟涟，这不是moral injury的症状又是什么？

有太多伤害过别人、自己又被伤害的故事，多到让我们的耳朵起老茧，它们成为20世纪的“中国叙事”。像曾彦修叔叔那样，1957年在人民出版社社长任上把自己打成右派，晚年能将自己的回忆录题为《微觉此生未整人》的人，少而又少。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反思潮”堪称20/21世纪之交中国的一项自发、自主、自觉的“思想工程”。人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80年代以中青年为主的“思想解放运动”上，而对此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以来延绵不断的、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在内的老年人（其中有我的伯父叶笃义和叶笃庄）以历史亲历者身份进行的反思性回顾关注不够，对这一现象的意义也估计不足。亲历者们不是“白头宫女话当年”，吃饱了拉闲篇，而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般严肃认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参与反思的重要群体

是中共党人，其中既有元老级的李维汉（上下册《回忆与研究》），也有我本人特别关注的“一二·九”/三八式”。在反思过程中人们不免再次体验 moral injury，再次感受良知带来的苦痛与责难，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疗伤的过程。

我父亲在耄耋之年写出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并披露他几十年来内心的道德创伤。在同一运动中，何方也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这成为他多年来除 1959 年揭发批判张闻天之外背负的另外一大“包袱”。他没有囿于个人经历，也没有止于倾诉伤痛，而是顺藤摸瓜，对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对“个人崇拜”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为此他阅读了大量参考书籍、包括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何方和曾彦修两位“延安人”有过多次书信往返，讨论切磋有关问题，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像热切的年轻人一样叫真儿。何方晚年的两部重量级著作：《党史笔记》和《何方自述》中“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篇章浸透着的，就是这样得出的心血成果。这两部著作的缘起与他本人经历过的两次重大道德创伤有着直接关联。Moral injury 既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长久的伤痛，也可以转化成令人追求真与善的巨大动力。

何方叔叔已经离我们而去。写这篇文章时，我脑中不断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一位“从延安一路走来”的老共产党人，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头儿。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何方叔叔深深的悼念，并表达我对世纪之交的一代勇于反思的中国老人的深深敬意。何方是其中的佼佼者。■

2017 年 12 月于波士顿

【追思】

追念何方

黄 星

2017 Newsletter

.....

Two months ago, on October the 3rd, I lost my beloved friend and mentor at the age of 95. Ho Fang was a well known pivotal and far-sighted scholar, an expert i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s many other fields.

Despite his poor health, Ho Fang ceaselessly continued to compile his collection of books covering various topics. Sometimes he had his voice recorded or spoke into the computer voice text. His wife, Song Yimin was his indispensable helper who transcribed all his recorded speeches into written words to compile his books. After his death, he left a large amount of speeches recorded on tapes and Yimin tirelessly continued the work of transcribing the tapes into written form producing articles and books.

I consider myself very fortunate to have known Ho Fang and his wife since the 50s last century. In 1950 Yimin and I worked in the same se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Later, after working in the Chines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Ho Fang was assigned to be vic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Administration Offi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 Fang and I were sent to the same Foreign Ministry Cadre School in Jiangxi to labour and do farm work. I stayed in the Cadre School for eight years and Ho Fang stayed there for nine years, one of the last to leave. Ho Fang had been assistant to Vice Foreign Minister Zhang Wentian for many years. At the Lushan Congress, Defence Minister Peng De huai showed his disapproval of the policy of the Big Leap Forward which caused millions to die in China. As a result, Peng was branded as traitor, renegade and reactionary opposing Mao Zedong which was equivalent to opposing the communist party. Zhang Wentian supported Peng and was thus falsely called a member of the clique guilty of oppos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had contact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s Ho Fang had been Zhang's assistant for a long time, he suffered badly for being allegedly connected with the so-called criminal clique. As soon as

Ho Fang left the Cadre School after nine years, he plunged right into work, and produced book after book. Ho Fang was advisor to the popular magazine Yanhuang Chunqiu, giving it tremendous help. Similar to Ho Fang's motto of "Truth" the magazine portrayed truthful articles, immensely appreciated by the large number of readers. Unfortunately, after 25 years of existence, suddenly without notification, the top authority last year on July 17th forcibly took over the magazine and changed its whole staff. The original staff and writers of the magazine keep on writing zealously and readers find means of reading their articles despite the strict censorship. In this era of science and cyberspace the public cannot be kept ignorant as before.

I feel it is an honour and privilege to own a collection of Ho Fang's books bearing his signature and numerous articles he had written.

.....

Frances Wong Sing (原供职于外交部新闻司和外交学院)

December, 2017 ■

【追思】

怀念何方爷爷

张秀君

何方先生于 2017 年 10 月 3 日凌晨 2 点 10 分去世了。

何方先生是我的外公张闻天的助手，但外界一直认为他是张闻天的秘书，一直以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1955 年我 9 岁到北京外公身边去读书，在外公家里不时能见到他。近年来看何方先生的书，才知道那是外公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时，让他住在景山后街的家里替他处理夜间外交急发事务的。那年外公 55 岁，何方只有 33 岁，但不知为什么，外公一直让我叫何方为爷爷，不仅让我这样叫，而且让他的儿子虹生也这样叫。至今在我的记忆

里，还有晚饭后他与闻天外公在家里小花园散步的背影，那时他俩都腰背笔直，给人年富力强的印象。

何方先生说：“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把他（张闻天）看作不光是上级，也是一位严师。”这句话很能说明他与闻天外公的关系，而在我看来，他们的关系还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何方先生1922年出生，1938年即进入延安，投身革命。1949年被闻天外公看中而成为其助手。1950年入外交部，任驻苏联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在闻天外公指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及有关工作。他与闻天外公的友好合作关系一直持续了十几年，从何方先生晚年写的书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所以到了使馆后，除工作、调研外，他（张闻天）也大抓学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外文学习，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也没有忘记在这方面使用我。在东北工作时，他就派我给省委机关上大课，那时讲的是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到使馆后，他又要我给大家讲《联共党史》，不定期地做时事报告。例如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了，使馆多数人不理解俄文，一些懂俄文的也嫌长，懒得看。于是大使就发话了：叫何方给大家讲两次。我只好照办。每次讲的时候，他也拿一个小板凳坐在一边听，这都更增加了我的紧张。”

“每逢星期天，多半是跟张闻天上书店。张闻天烟酒不沾，没有什么嗜好，买书似乎成了他的唯一嗜好。刘英喜欢逛商店，不喜欢跑书店，所以张闻天就以拉上我的时候居多，往往一到星期天，他喊一声：‘何方，走，上书店！’我们就出发了。”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为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中间有一次短暂休会，直到1954年7月21日才以达成协议而宣告结束。但休会后张闻天就把我调回使馆，给总理打招呼，不让我再去了。原因是他担心周总理把我调走，这是他明说了的。”

“我跟张闻天工作十多年，对他的想法和意图应该说还是有相当了解的，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讲到什么程度，这个分寸也还能掌握住。因此，他对我比较信任，相当放手。”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很多……。这是两人良好合作的十几年。

以后 1959 年庐山会议，张闻天因说真话受到批判，何方迫于压力，在反右倾运动中揭发了张闻天，那年他 37 岁。我多次在文章中看到他这样写，也多次在访谈节目中听到他这样说：“我这一生犯过两大政治错误，一个是 1942 年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个是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这两次烙在灵魂深处的耻辱，令他到暮年还不能解脱。1978 年春天，在刘英回到北京后，何方立即去看她并做检讨，但刘英却不同意何方做检讨，反倒认为他们牵连了何方，跟着他们吃了苦，还影响了前途，对何方表示了谅解。

这以后何方就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参加了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1979 年 8 月 25 日，张闻天追悼大会召开，由陈云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而悼词正是由曾彦修、徐达深、何方起草的。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这就标志着中央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后来何方先生又参加编辑张闻天文集的领导小组，做了许多工作，与刘英也保持了 20 多年的联系。

2016 年 4 月我去北京旅游，特地与闻天外公的秘书萧扬一起到北京顺义何方先生的家中，那时何方先生虽然腿脚已没有力气，但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谈笑风生，还送了他写的《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一书给我，在扉页上还题了字“请亲爱的小秀君留念——何方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一日”。何方爷爷还是把我当作是当年住在景山后街的那个张闻天的小外孙女呐！那天我们还合了影，何方先生夫妇两人表现的对我的关心与疼爱，让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对闻天外公的敬意。

何方先生去世了。他的晚年反思经历过的道路，检讨功过得失，敢于承受切肤之痛，无疑是值得尊重的。他的忏悔是真诚的：“1959 年我揭发批判张闻天，我错了，对不起张闻天，对不起党，对不起我自己，我没有实事求是。”能有几人能在全国人民面前这样公开检讨？（有人在张闻天平反后，还继续坚持对他的诬陷）。耄耋之年的何方先生面对历史的坦荡心胸令我们刮目相看。

闻天外公在生前，没有听见何方先生说这些，但是他的夫人刘英听见了，我们也听见

了。经过30多年的思想包袱和研究张闻天历史，何方先生已经没有必要再背历史的包袱。何方先生90多年人生路的风风雨雨实属不易。生前何方先生就决定遗体捐献，表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告别仪式后，遗体被抬上灵车的那一刹那，不少人高喊：“何方叔叔再见！”请让我——张闻天的外孙女也怀着崇高的敬意喊一声：“何方爷爷！您一路走好！”

何方爷爷！您安息吧！ ■

【追思】

张闻天研究的领军人物

张勤龙

在微信朋友圈里，惊悉何方老师不幸去世，心里一凉，不敢轻信，急忙求证于萧扬老师才知：秋送落叶，噩耗真实；先生远去，不再回家。中秋时节，唯有痛悼。

何方老师是张闻天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因为在张闻天故居工作，我才有机会认识何老师并有幸拜读了他写的不少文章和多本著作。何老师学历不很高，但学力不一般。如今的硕士、博士、博士后、洋博士、甚至大学一般的教授、博导都无法和何老师在做学问上匹敌。何老师年高人不老，思想很活跃，研究跨领域，下笔如有神。他是当代中国思想界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何老师记忆力惊人。他读过《红楼梦》，能过目不忘。外交部的同事们开始不敢相信，便故意“考查”他是否真能背出120回的《红楼梦》，居然成为外事工作间隙曾经的一出“活剧”。何老师在外交部是张闻天同志手下的一个重要骨干。他跟随周恩来、张闻天等出席了著名的日内瓦会议，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现被周恩来总理越来越赏识，以至使闻天同志感到了十分的“不安”，于是，张闻天同志果断下令让何方不再参与后期的会务。因为，如果何方真的被周总理看中并正式提出商调，那结局张闻天只能违心服从。因此，为保住

手下这一位爱将，张闻天只好采取果断“回避”的办法来慢慢淡化何方在周总理心目中的好印象。

张闻天和何方在延安工作时就相识了。1945年，张闻天去东北，何方也一起北上；解放后，张闻天去苏联担任驻苏大使，何方也去驻苏使馆担任了研究室主任；1955年，张闻天回国做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何方又被任命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有人说，何方是张闻天的秘书，其实，秘书的职位他一天没干过，不过，在平时何方倒真像秘书一样，常常出现在闻天同志的身旁。外交接待不分昼夜，为了闻天同志的健康，周总理特别关照，半夜三更的外交事务尽量不要去打扰张闻天。因为，闻天同志的心脏不是很好，晚上一有事，整晚睡不着，白天的工作便大受影响。为了解决好这个矛盾，有一个时期，何方常住张闻天家里以便晚上替代主人应付夜间外交事务。因此，何方同志不是秘书，胜似秘书，在庐山会议后，被当作张闻天同志的“亲信”无故挨整。共同的命运反过来倒促成了何方同志成为张闻天生前最亲的知音。

于是，在张闻天同志平反昭雪后，何老师自然又成了张闻天研究事业的一位领军人物。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了悼词，而何方同志正是这个重要悼词的三个起草人之一。张闻天研究事业能有今天这种大好局面也是何老师等苦心经营长期努力的一个结果。

百年党史，拨乱反正，何老研究，功莫大焉。何方同志的骨头很硬，学问很深，实事求是，有胆有识，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当代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先进到老，中国当代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中央领导干部，都几乎跟不上他前进的步伐……何方同志长期在张闻天身边工作，深受张闻天同志的影响。从何方同志的言行中，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张闻天同志的伟大。何方老师人生奋斗的精神和张闻天同志的一样是当代中国青年学习的楷模。

中秋节里，阴风习习，薄云遮天，不见圆月。此时此刻，涌现在我心头的，只是对何方老师的不尽哀思……■

【追思】

忆何方伯伯

詹志芳

在伦敦接到宋阿姨的微信，知道何方伯伯仙逝了。看见大人物纷纷送挽联，怕有混入上层（公知）之嫌。想想还是写一篇文章纪念他吧，我们已经认识36年了，做楼上楼下邻居也有近20年。

何伯伯看着没有什么特殊，和他接触越久越发现他的身上闪光的品质。而且，是越老越光彩。

何伯伯中等个儿，偏瘦，长脸，分头，兼有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样子，一口陕西话。穿着朴素，虽然一解放就做了驻苏的外交官，但毫无洋派作风。有一年我父母家里装修，就都住过来。我父亲通过我，认识了何伯伯。他们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父亲和何伯伯每年政协开会碰面，工作又和日本有关系。其实，他们三人（我父母和何伯伯）都是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彼此不知道。我请客，请他们老哥俩聚聚，因为他老是叫我父亲老弟。那次，他在面包上一定要抹黄油，才露出一点儿洋的端倪。

何伯伯好争执，但多对宋阿姨。其实，宋阿姨小他九岁，还得让着他。我曾经没大没小地抢白过他，他不说话。同楼的董乐山因为退党，1957年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身患肝癌，脾气极大，也顶撞过何伯伯。他很有风度，也不出声。

他住在我们这楼，大家都受益。那时，每周只休息一天。周日，他从楼上到楼下，把楼梯拖一遍，他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一拖就拖到了快八十。他搬走后，我有时也拖地，当然是依葫芦画瓢，学他了。不过，我是三次大手术，体力不支，不能持之以恒。

还有一件事也要归功于他，我们楼里十二家都是社科院的中高级干部，每到春节大年初一早上8点左右，他就开始团拜了，他从楼上拜起，每家都进，接着所有的人都跟着下

来，拜到一楼结束。年年如此，一直到他搬走。再也没有人有他的号召力了。

他上班还不坐公家派给他的车，每天步行去东四十条。这也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地方。

何伯伯有许多事情，都历历在目。他的言谈举止，他的陕西人的犟劲儿。

虽然，何伯伯离家很早，对家乡的饮食终身喜爱。因为，我插队的地方离他家乡不太远，有许多的习惯都差不多。我们还有些共同的话题。

何伯伯家的保姆都是从老家请来的，他们出钱让这些姑娘学点儿技能，给的工资也比别人家高，他们把这些保姆都当成他们家亲戚。我有事，他和宋阿姨都让保姆顺便照顾我。他们家的保姆都是我的朋友。这个楼里，可能只有我享受这个特权。

因为，何伯伯没有架子，宋阿姨也平等待人，我在这个楼里除了去徐梵澄先生家最多，再就是他们家了。第一次见他，是在1981年底，我和我先生来团结湖看房子。因为户型一样，就到他们家看看。他和宋阿姨都在，两人毫无架子，热情招待。记得何伯伯还颇为得意地介绍他在干校做的家具，晒台上还放着他的木匠工具。作品没有什么特殊，所以印象不深。但是，他做了几个木工的刨子，那可是硬木的，需要相当的水平。近年，看了一些鉴宝节目，才知道刨子的木头多用硬木。

我们搬到了一个楼里，才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原来，他是中学生时，15岁就自己跑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在延安上了抗日军政大学，从学员当到助教。又上了延安外语学院的俄语系。他送过我一本书，书上写到他那时一边抬土筐一边看书。我在上下班乘地铁时也看书，就是受到他的影响。

他因为协助张闻天工作。所以，张闻天挨整，他也就跑不了。那时，他顶不住也揭发了张闻天。后来，被下放到农村。他说差点儿就饿死了。有一次偷吃萝卜，他吃了40斤，简直让人没法相信，那可真是饿极了。

接着又是文化革命去干校，他从1959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将近20年。

在这期间，他思考了许多。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马上就改。他找到刘英大姐承认过去揭发张闻天的错误。因为他的真诚，刘英大姐非但根本不怪罪他，反而对他无话不说。

通过他的研究和同刘英大姐聊，他发现出版的党史，与真实的党史是有距离的。如果不能正视这些，共产党是无法进步的。他就想啃啃这个硬骨头。他花了6、7年的时间，写出了他所了解的党史——《党史笔记——从遵义到延安整风》，纠正了党史里被歪曲的地方。他写完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他并没有因为年纪大而停手，反而觉得要抓紧时间把他看到的问题都写出来，让今后有一个借鉴。

今年春，我还和老邻居蒙伯伯一起去他顺义的家看他，他请了司机接送我们。他见到我们高兴极了，让保姆做了一桌子菜，还炖了甲鱼招待我们。他送我《历史要真实》，我送他我的《轮椅走天下》。他拿着我的书，我拿着他的书，我们合影。那次合影，就是我们最后的留念了。他已经行走不便了，还坚持送我们。他还在写关于外交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他是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党，才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非要把事实写出来。

何伯伯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直言不讳的一生，也是坦坦荡荡的一生。他没有因为地位高了就追求享受。他知道写这些书会吃力不讨好。但是他还是执着地做，一直到去世。

何伯伯，你是我们的榜样！■

【追思】

忆何方

陈启懋

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党史专家何方同志走了。

何方同志是我的好朋友，在国际问题研究上也是我的良师。我与他相识在1988年。那一年7月我参加香港岭南学院黎凤慧博士举办的一个亚太形势研讨会。会后与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的宦乡同回上海。宦乡时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他来上海治病，手术后在上海养病。何方时任这个中心的副总干事。当时宦乡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

有些想法，就请何方来上海商讨并起草一个报告。何方与他同住上海的一个高级招待所。我当时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常去看望宦乡，这样就认识了何方。

宦乡逝世后何方主持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工作，每年要举行一次国际形势研讨会，我每次都去参加。这样与他就熟了。一次他在上海时，我曾陪同他去浦东参观张闻天的故居。

（外传何方曾担任张闻天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的秘书，何说他当过张闻天的助手，没有做过他的秘书。）

1990年6月15日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由江泽民召集的一个座谈会。会议没有宣布主题，但当时对外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打破“六四”后西方对我国的制裁。会上江泽民点何方第一个发言。何在分析形势后着重提出在国际问题研究上要打破禁区，让大家畅所欲言。接着江要我发言。我对如何打破制裁提了三点意见，设法缓和与美关系，以日本为突破口，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想这些意见何也是同意的。何后来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很重视对日关系的改善。

以后他们搬到北京东郊一个小区去住了。我每次到北京开会，回程时必到他家去拜访，与他畅谈国内外形势。他对我谈起对部分高官腐败的担忧。一些情况是我过去不了解的。由于他们家住在去机场的路上，所以我常常是在离京那天去拜访的。谈话后直接去机场。他夫人宋以敏招待很热情，但一般不参加谈话。她自居为后辈。实际上她对一些国际问题也有很深的研究。

大约是1990年，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在上海举办了一次国际形势论坛，请有关专家参加，各抒己见。何方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发表观点，我也在会上讲了看法。我记得当时我提出了一个双重结构的观点，即认为冷战结束后两种势力相持不下、处于相对均衡状态。何方对我的观点没有表态，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没有在会上讲，而是与宋以敏一起到无锡去了。

这以后，我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除了节日打电话问候外，我还把我写的一些文章，在发表前发给他征求意见。2012年我把一篇论文稿“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什么是社会主

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请他把批评意见批注在原稿上退回以便修改。何方认真审读了此文并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他回我的信中说，看到来信和文章“真有如见故人之感，心里实在太高兴了”。并说他按照我的要求，在原稿上批注了些随时想到的意见供参考。这里把他的批注中的重要的观点概述如下：

(1) 1985年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全球化这个名词。从这一年起，世界上兴起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两大潮流，此后不到10年，世界参与市场化的人口从不到1/5（只6亿）很快发展到近百分之百（近50亿）。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就是在1992年前后从计划经济一下子变成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潮流也来势很猛，欧非在三百内就化掉了，后卡在了叙利亚。

(2) 私有制和市场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三十多年来飞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也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所谓改革，就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如从人民公社到归户经营）；所谓开放，就是参与全球市场化。

(3) 社会主义是人类长期以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的憧憬。空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和大同世界之类可追溯到奴隶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描述也是属于高级乌托邦。这已是多数学者的定论。

(4)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对“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是马恩在当时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更多地还是要追求的目标。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是脱离现实的。

(5) 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段话去掉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憧憬：正义（或公正）和公平。他说的这些，北欧已基本做到。它们实行高额累进税，富人们也只好承担，所以社会稳定，没有闹过大的社会风潮。连英国，王震都说“如果再加上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但北欧国家并不认为自己已实行社会主义。前瑞典首相帕尔梅讲，（几十年前）世界上当时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已有70多个，但他却把社会主义因素最多的瑞典排除在外。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一直认为瑞典仍属资本主义。

(6) 按马克思学说搞社会主义的（如苏联、东欧和毛时代的中国）都统统失败了。苏联没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已被称为“政变”），也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试验了若干年，以人民受大罪和彻底失败告终。实践证明此路不通。

(7) 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国际主义，都大有问题，已基本上被各国党扬弃了。中国党从十三大起，已不再提国际主义，也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中国加上中国特色。朝鲜改称主体思想，都已不是原来了解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更是不同的两回事。马列主义书籍在朝鲜早已绝迹，且属禁书。

(8) 中国头三十年（毛管了二十七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绝对倒退。除两弹一星之类个别技术，整个水平降低到连解放前都不如，单饿死人就是 4200 万，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与新民主主义的解释绝对相反。现在理论界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建立的是皇权专制主义，毛本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方毅首先提出）。其时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实无民主、自由可言。

(9) 由于毛泽东错误路线的耽搁，中国丧失了三十年的最好机遇，补偿起来得以百年计。要正视历史，吸取教训，无须掩盖错误，为尊者讳。

(10) 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对经济的调节管理。所以前者又称自由资本主义，后者则为有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

(11) 反垄断法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制定的，为了保护自由竞争，非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时代，但克服不了垄断。

(12) 跨国公司则是另一回事，它是经济国际化（以国家行为为主体）转化为全球化的主角。作为经济实体，约五十个左右的跨国公司，其实力已超过百余国家的实力。

(13) 二月革命尚未建立起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前，就发动少数以政变形式夺取了政权并以暴力推动当时主观上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跳过了民主革命和它应完成的任务，社会似乎前进更快了。但不管过多长时间还得回过头来补课，完成民主革命阶段没有完成的

任务。苏联已经被迫退了回来，原参加苏联的国家现在都在分头补课了，偿还列斯为他们制造的灾难和落后。斯大林已被抛弃，列宁正在被抛弃。只是俄慢，其他国家（包括东欧）快而已。中国也将只得走回头路，实行宪政民主，中国党是逃不掉的。

（14）向社会主义过渡从共和国成立起就算。这是毛的原话，也是党史国史至今的正式提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或时期。我一直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伪命题，只能骗人而不能实现。因为它的灵魂是共产党的领导，而一旦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民主（不论新旧），自然就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不但是理论上的分析且为实际一再证明。

（1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新一轮民族独立运动高潮过去后，和平与发展时代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时代，传统资本主义也已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把武装夺取政权说成是普遍规律是错误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多数党放弃，被他们从党纲党章中删掉了。第二国际（现在还可算存在）反对列宁的主要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当时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党的专政，最后必然变成个人独裁。二战后的国际共运大多不再谈无产阶级专政了。现在大谈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使人感到奇怪了。

（16）中国历史上并无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个人独裁。中国苏区或解放区只有游民阶层，基本上没有无产阶级。那里发生的乱杀，就是游民头子（痞子）制造游民阶层互相残杀和杀老实农民。

（17）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的发展是多种所有制和市场化的功劳，而不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的功劳。

这是我与何方最后一次深入的交流。他的观点我基本上都同意，除个别例外。如我认为对新民主主义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初期（1953年前）和建国前的解放区实行的就是新民主主义，还是比较成功的。但后来毛自己把它抛弃了。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补这个课。

这次交换意见后就没有机会再作这样深入的交流了。现在斯人已去。中国思想界少了一位哲人，我少了一个良师益友。■

【追思】

何方是敢说真话的老干部和自由派学者

——在2018年2月22日聚会上的讲话

茅于軾



何方老是个老干部，是高级干部，不是一般的干部。他还是个敢说真话的老干部。这三个条件加起来，使得他非常地对社会有影响。

我和何方老有一段很紧密的接触。那是1985年社科院派了个代表团到美国去，和布鲁金斯学会讨论亚太的经济和贸易问题。

何方是日本研究所所长。我们代表团的团长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浦山。浦山是受尊敬的一个学者，但是他的学术思想非常地“左”。他反对用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析方法。我呢，在会上就谈到了这种学派的分析方法。结果回来后，他大不以为然。

何方呢，他是日本研究所长。但是，他的知识面非常广，而且思想非常开放，是个自由派学者。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和何方老后来联系不多。但这十天时间里的紧密接触，特别是和浦山对比起来，使我的感受非常强烈。

我们以前每年一次的聚会，每次都能见到何方老。我今天坐的位子，以前总是他坐的，因为他的年龄最老。今年见不到他了。人总是要走的。但我们的生活需要乐观。■

【挽文】

何方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副部级离休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研究员何方同志，于2017年10月3日凌晨两点十分不幸逝世，享年95岁。

何方同志的逝世使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使国家失去了一位个人经历丰富的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问题专家，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和引路人，使亲友们失去了一位最可敬爱亲人。

何方同志1922年10月18日出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1945年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省青委副书记等职务。1950年入外交部，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十年动乱结束后，1978年恢复工作，1979年参加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1980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88年3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9年至1995年，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1991-2000年任中苏、中俄友协副会长。1991年，评为有突出贡献者，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2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3年，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201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

何方同志一生忠于党的事业，孜孜不倦地研究国际问题，留下大量宝贵的思想成果。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撰写的《当前民族独立运动的几个问题》、《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南北差距的新变化》、《过渡时期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争议下的国际问题研究》、

《何方集》等重要论著，丰富了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宝库，为开创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何老同志最早提出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观点，突破了在这个影响全局问题上的羁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在党史问题上，结合个人经历写有《何方谈史忆人》等著作。关于日本问题，他主张从国家的基本战略利益出发发展中日关系。何方同志在长期的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精神，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何方同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严于律己，务实求真。在他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一贯重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重视学术上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见解和政策意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何方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2017年10月3日

以敏同志：

何方同志突然去世，使我俩十分悲恸，望您节哀。我患右腿不能行动，不能前来悼念。特祝老友遗著永传于世，教育后人。请杜老送上此简。

李锐 张玉珍 敬挽

2017年10月6日

纪念何方同志：

唤起民众 实现宪政

杜导正 敬挽

2017年10月5日

悼念何方先生

惊闻何方老今日凌晨不幸逝世，至感悲痛。何老生于1922年10月，享年95岁，虽曰高寿而终，不过他这些年来展现的思想和生命活力，真不似一位耄耋老人之态。他少年赴延安，1945年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1950年随张闻天进入外交系统，驻节苏联，在中苏关系方面多有成就。1959年蒙受政治磨难，心志不改。1979年平反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俄友协副会长等职，并受聘任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何老年过七十仍笔耕不辍，以其丰富的历练和学养洞察历史，针砭时弊，对马克思列宁学说，中共、苏联历史以及中苏关系史，对张闻天的功绩地位等领域所做反思和研究均堪称经典，启迪后人，泽被民族，功不唐捐。

我有幸多次参加他和一些前辈的雅集，有他出场，一定是春风沐浴，智慧充盈，满堂欢乐。即便是近年风声鹤唳，何老本人亦常遭庙堂指斥，有司约谈，种种戒律，但却难撼其民主宪政之志向与达观明澈之心境。谁料天不假年，溘然长往，我失良师，国失梁木，怎不令天下追求自由者悲叹痛惜！愿何方先生安息！

贺卫方

2017年10月3日 于北京

宋学长：

何老突然离我们而去，我很悲伤。在这“严冬”之际，我所尊敬的思想者一个一个走了，心里确不是滋味。

请学长节哀。您一定要保重身体，何老的一些遗作还需要您整理。我们还得继续前进，继续生活。我5日去山东，不能同何老告别了，只能在这里祝何老在天国快乐。

杨继绳

2017年10月3日晚

以敏同志：

顷悉何方老领导不幸逝世，深感悲切。他的名著《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尤其令我钦佩，认为经典。虽然我们联系不多。但仍是念想的。所以突闻噩耗，是难以接受的。还望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周阳 顿首十月三日

何老有信念、有思想、有胆魄、有能力，阅历丰富诙谐风趣。

老人留给我们很多很多，平静地走了。但愿不再有风雨打扰他。

日本研究所友人

日本问题研究的老前辈何方同志的不幸逝世，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他为日本问题研究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谨向何方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请各位遗属节哀、保重！

刘德有 挽

前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

宋老师：

惊悉何方老前辈遽然仙逝，我十分悲痛。记得9月29日与你通电话后，我还信心十足，以为他会像周有光先生那样长命百岁，不料上苍早早地召他登入天界，事情来得那么突然，你也许没有多少心理准备，此刻，你千万要节哀、保重。这几年，为照料老先生，你贡献最大，付出最多，自己也十分疲惫、劳累。何方留下的著作和雄文今后要靠你整理出版。衷心祝愿你挺住这一沉重变故，尽早从哀恸中走出来。我心中敬仰的三位长辈——慎之、周老和何方老，现在可以在上界相聚了，他们之间的交流从此以往就更便捷、更自由了。

何方老的一生活得轰轰烈烈，活得浩浩荡荡。建党言，争先恐后；讲真史，勇往直前。我一定要以他为榜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不息！

后辈 张森根 敬上

宋大姐：

听到消息，还是感到愕然。人生如旅，上车下车，或迟或早，只是必然过程。我知道您不舍，感觉难过，请节哀。

何先生有那么丰富的人生，也留下那么多的著作，供后人留念。我想如果有在天之灵，他一定觉得快慰，不负一生。我很怀念在您们的会晤。

陈永发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2017. 10. 4

宋老师：

收到消息，心情非常沉重及哀伤。去年到访您家，何老师和您对我的亲切和关怀，及他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还历历在目。虽然时常想念你们，但国内气氛紧张，我也一直未再来京，如今没办法再和何老再聚，实在令我觉得很伤感！

宋老师您要千万保重，我会为何老在天之灵祷告，也为您祷告！宋老师您和何老相濡以沫几十年，您的心情我可以想象到。希望我们还能保持联系。

沉痛悼念何老！

小余（敏玲）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深切悼念何方老先生

惊悉何老先生仙逝，令人至感悲痛。多年来，我们如同亲眷一样常来常往。2017年元月21日离京前，我们在顺义府上一起促膝相谈，从早到晚依依不舍。先生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在眼前耳畔萦绕，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多年来读先生的书，听先生的言，亲受先生的温暖，建立起骨肉一般的情感。到海外后，虽然海天相隔，却时时相互牵挂和惦念。时不两日总要用微信与宋师母传递信息，相互问安。而今，先生走了，这份思念将永远留在心间。

先生刚直不阿，实事求是，宁静致远，尊重历史的个性是我们的楷模，与先生结缘是我们的荣幸和骄傲。《何方杂谈》、《党史笔记》、《何方自述》等著作将作为历史资料进入国人的档案馆，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和财富。

老先生九十五年的人生历程是丰富多彩的。他生如夏花而绚丽，逝如秋叶而静美。在这秋意浓浓的季节寿终正寝，驾鹤西去，卓然不朽的灵魂与他不朽的著作将作为一面旗帜，永远高高飘扬在祖国的上空。

秋风萧萧，落叶飘飘。我们思念他，我们热爱他。祝他一路走好，永垂不朽！

你们的学生及至亲：

拜怀德及全体家人

2017年10月3日秋

宋以敏老师：

刚才听朋友说何方老去世，十分意外，万望节哀！多多保重！你肩头的担子还重，需要完成的事还多。何方老有关文革的回忆口述若整理完成，可以选部分给《昨天》发表。

致礼！

重庆 何蜀

2017-10-04

悼我们全家的师友 何方

张何两家党情惊世界，二百老人齐赞张闻天。党要真实党员代代传，我们永远在何方身边。以敏同志，你同何老亲情一世，共同研究写作，共同革命、战斗，你还得从电脑上帮他一把，何老西去，你当然最苦最心痛，千请保养好。

胡甫臣

以敏同志：

今日网上惊悉何方同志仙逝消息，不胜悲痛惋惜！我们不幸失去了一位前辈、导师。何方同志为革命贡献一生；何方同志为革命真理奋斗一生。光明磊落，坚持正确，无私无畏！特别是晚年花费极大精力和智慧，辛勤笔耕，为正确阐明和捍卫党的正确历史和路线，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您痛失数十年相濡以沫的伴侣，我们痛失近年来奉为指路人的良师益友，不胜惋惜悲痛。唯望您节哀顺变，保重身体！继承遗愿，珍惜晚年！

您的好友：马耀徽、韩效琦、李梅彬、郭健、余南南

2017年10月5日于北京

宋老师：

收到消息，心情非常沉重及哀伤。去年到访您家，何老师和您对我的亲切和关怀，及他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还历历在目。虽然时常想念你们，但国内气氛紧张，我也一直未再来京，如今没办法再和何老再聚，实在令我觉得很伤感！宋老师您要千万保重，我会为何老在天之灵祷告，也为您祷告！宋老师您和何老相濡以沫几十年，您的心情我可以想象到。希望我们还能保持联系。

沉痛悼念何老！

（香港）余詠恩

宋以敏同志：

得知何老突然去世，感到万分悲痛。生前未能见上一面，已成终身遗憾。希望您一定节哀。你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所以你一定要节哀，保重身体。由于我骨折，胡健最近又动了个小手术，所以，最后我们也没有前去送别悼念何老，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心痛。你一定要节哀呀！

胡健 周振中

2017年10月6日

宋老师，您好：

惊闻何老仙去，不胜悲痛，晚学虽仅与何老有两面之缘，但他的思想与人格却注定影响我一生。何先生的赠书我让高二的儿子也认真读了，他在今夏的哈佛大学夏校社会学关于文革评论的论文中引用了很多何老书中资料史料，哈佛教授给了A-的同学最高分，这也说明何老思想的伟大。

何老和您是我见过的极少数纯粹的共产党人，您们不只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见证者，也是真正的缔造者。新中国的革命历史是何老和您这代民族脊梁撰写的，而其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与追求也是您们一生坚守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崇拜，传承。

其实何止精神，何老与您的一言一行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典范。过对我们这样的小学生，您们在离开时都起身出门相送，让我们知道仁义礼智信的知易行难，而能得遇像您二老这知行合一的前辈真是三生有幸。

何老九旬逝世，也是仙寿，请宋老师节哀保重，或有用得上我们之处，一定告知。学生定效犬马。

姬涛

2017-10-15

杰出的学者何方先生离世了，但人们对其真诚的追思与怀念，却将他的印记永远地留下了！尽管何先生有“体制内”的标签，但更有为改革旧体制而求真务实、追求民主与宪政理想的知识分子的骨血——这一最后的形象定格在生命的终点，使先生和良知相拥，同历史共存。他虽身居高层，却并不属于任何一种的权贵角色。作为学者史家，他的正直、自醒、胆识和坦言，只属于一个为人类效命而不为权力献媚的探索者。对于这样的学人或长者，无论他在怎样的位置，处于怎样的时代，都深得人心、值得尊敬！可惜的是，中国的知识人可站成一片望不尽的森林，可这样的良心之树竟然未必能形成茂密旺盛之势。正如施滨海先生所言：像何老这样的人越来越难以出现了！好在今天的追悼会上，我还是遇见了一批在不断呼吁社会转型、并努力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动力的体制内外的师友们。人们纪念何方先生，就是在纪念这个时代不灭的灵魂之光的同时，继续探明中国的未来路在何方？今日，我写给先生的挽联是：“认党认国认民泾渭分明，与事与理与情爱憎随心”。我以为：先生所拿捏的学术分寸、奉行的精神原则，足以提醒文人学者们，尊重历史，立足真相，为民立言，方能为人类建功业，为现世开太平。

苏小玲
影响力网站
2017年10月8日

宋以敏：

惊闻何方同志仙逝，不胜悲痛。何老一生坚持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不畏强权，不惧压力，笔耕不辍，在党史研究、外交实践和国际问题理论等方面建树颇多，留下丰富的遗产，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何老走了，但他不虚此行，安息吧！望节哀！

朱烈 兆梅

宋以敏同志：

何方同志走了，我们深感悲痛。老首长的才华、文采、风趣、平易……他的音容笑貌都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永远怀念敬爱的老首长！

李同文 孙林

宋阿姨、何宁：

惊悉何老仙逝，心情沉痛，想给您们打电话，又怕打扰，不知如何安慰您们才好。何老给予我的教诲和鼓励，他深邃的思想与风趣的谈吐会永远印在我心中。

李薇

宋阿姨：

惊闻何叔去世，痛惜我们失去了敬爱的长辈，失去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少有的博学的讲真话的老革命。

小平 娜亚并代表全家

何宁：

何方先生是我们大家做人的楷模。中国历史上会为正直、勇敢、睿智、坚毅加上浓重的一笔。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也请你节哀顺变。

高西庆

何宁：

惊悉令尊大人仙逝，不胜哀恸！何老坚持真理，忧国忧民，品德高尚，高山仰止，望节哀顺变。

张懿宸

宋老师：

惊闻何方先生仙逝，不胜悲痛！老先生精神、风骨、卓见将永远留在我心中并影响着我們。祈愿老人家一路走好。请宋老师及家人节哀顺变。

晚辈（陈）翠玲泣拜

宋大姐：

惊悉何老去世，十分悲痛。何老是一位坚持真理，有骨气的共产党员，值得我们后辈学习，何老离开了，可以同吴建民在天堂无拘无束地谈天论地了。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望大姐节哀顺便。

施燕华敬上

老宋，您好：

惊闻何老突然辞世，心中深感悲痛。望您节哀顺变，也祝何老一路走好！

訾建中

老宋：

惊闻何老仙逝，不胜哀痛！何老是我十分尊敬十分钦佩的老人，他在生命最后的三十

多年仍然笔耕不辍，在众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党史研究领域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贡献更加独特。他的逝世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的为人为学的精神将永远鼓舞后人。望节哀保重。

宋明江

宋以敏大姐：

惊悉何老仙逝，深感悲痛！特向您和您全家表示深切哀悼！何老在80年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事业、全国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孜孜不倦，奋斗终生，堪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何老是中国外交战线老领导、老前辈，对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难得的七八年相处中，我们眼中的何老知识渊博，刚毅正直，平易近人，是老干部中的楷模，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敬爱的何方老千古！请宋大姐节哀！

舒鼎 周凤仙及全家敬挽

何方先生是思想家，他对中国基本问题的思考，深刻而慎密，启人心智。

何方先生是学问家，他在党史和外交方面的研究，推陈布新，另开生面。

纪念何方先生的最好方式，是读其书，穷其理，学其胆识，踵其步武。■

啟之 2018-1-1

【挽联】

握手犹温，音容犹在，先生竟遽归道山；

党史存真，反思存鉴，后者应勿忘担当。

陈远挽

党史存笔记，延安存反思，先生精神不死
史界称董狐，党内称直声，后辈努力难息
陈远再挽

何方史可鉴
惟汝言以真
陈远焕 邓伍文 敬挽

敢问路在何方？
却聞天下为公！
普世价值
陈兵 敬挽

少年迷失 中年入误 晚年梦醒著史 消除我执 大圆镜智
延安趋使 西安丧失 京师铁笔成智 大德圆满 具足转识
何方神圣 炎黄董狐
陈世和 敬挽

审时代大潮 倡和平大局 面折廷争真国士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去芜存菁太史公
何方先生千古
丁东 邢小群 敬挽

沧桑历尽不改赤子心，晚岁著述犹动人，噩耗传来时，只憾为何是先生？
身居高位未失书生气，回望来路启深思，贤者归去日，仍盼历史出三峡。
重庆 丁颖 敬挽

光明磊落 中流砥柱迎浊浪
务实求真 大吕黄忠遏行云
杜莉 敬挽

别了临潼，少年青年，从延安一路走来，反思有泪
退居京师，党史国史，到暮年两手作文，铁面无私
痛悼何方先生
傅国涌 敬挽

学者本色 求真求实求正理
史家情怀 写书写文写春秋
悼何方先生
郭于华 敬挽

从延安一路走来 党史有笔记
说自己想说的话 历史要真实
韩三洲 敬挽

秉笔直书论党史
恣肆汪洋谈天下
怀念何方老师
雷颐 敬挽

幸甚五百年前与公一家，今日国庆当年国殇，
闻天有召翩然去，苏联不在苏轼远，惟留千古恨。

哀哉多少天来长夜对话，纸上风云腕底风生，
何方无你岂入史？神州到处神话里，人间万岁梦。

何方先生仙逝

沪上 何振华 痛挽

国庆遇国殇 风雨苍黄七十载 公民痛失一代良知

中秋忆团圆 社科老友二十年 后辈追思老伯先贤

何迪 王苗 敬挽

两次灾灾后梦醒

两头真真实可信

何方先生千古

贾新民 敬挽

党史专家书实事

后人求是感何方

何方同志千古

李锐 敬挽

朝朝握管记信史

暮暮难卸国事责

真正知识分子

李南央 敬挽

史贵存真，去岁中秋忆闻天；

人贵立信，今夜月圆照何方。

李永忠 敬挽

半世纪外交研究 板凳数年 惜国士去国

十余载党史钩沉 匡时祛魅 叹何方为何

李文子 敬挽

高贤何方，虽缘慳一面，有存信史传吾人；
今朝董狐，敢不隐书法，无惧秋肃临天下。
我辈治学楷模

李逊 敬挽

真儒群内众心楷模

伪史塘中一朵芙蓉

四川 自贡 李汝高 悼何方老

鲐背之年奋笔疾书舍何方公有谁人
赤子之心探寻真理振聋发聩惟此公
李仲明 谭秀英 哀挽

直言著述 无私无畏 信史雄文惊天下
追求真理 大彻大悟 胆识睿智启后人
李昕 敬挽

欲逐离情从逝水，偏偏耿耿难休。流光不肯为君留。先生骑鹤去，日落故人秋。
何意名山传信史？却曾漫说曹刘。多少英雄古来愁。低吟芳草岸，看杀帝王州！
悼别何老

潇湘 刘火雄 敬挽

具良知恢复青史真相
重启蒙指斥满纸荒唐
刘济生 敬挽

乌龙半世，理清还凭《笔记》

华夏百年，可知路在何方？

痛失董狐

牟广丰 敬挽

何人如君 坎坷一生 历劫持守公民志

方正为文 率真两头 终生问道鸿儒心

痛别先贤

秦晖 金雁 敬挽

少年失足 自以为是搞革命命运多舛

老年醒悟 痛定之痛写党史史鱼之俦

商昌宝 敬悼何方老

《党史笔记》 求真求实廓清谁是总书记

《谈史忆人》 大彻大悟反思历史责任人

施滨海 敬挽

何君著信史 秉笔直书天长地久

方家立宏论 诚心正意日彤月明

沉痛哀悼陕西籍临潼老乡何方

石高宏 敬挽

认党认国认民泾渭分明

与事与理与情爱憎随心

苏小玲 敬挽

弱冠投笔从戎，陕北辽东苏俄，八千里路云和月
晚年纵论天下，日本美国中国，扞虱倾谈四座惊
孙承 敬挽

撥雲見日一支筆，
脫胎換骨兩頭真。
孫國棟 敬挽何方先生

铁笔如椽，揭光明和黑暗党国真相传青史；
金睛似炬，识和平与发展世界大势醒众生。
王东成 敬挽

悼何方先辈
忧国忧民 终生奋斗无可奈何
患天患地 一世追求未得良方
王道诚 敬挽

忧国忧民忧天下
何去何从向何方
王玉成 敬挽

何方神圣，敢遣春温上笔端，直道党史有曲委
无由情种，能为家国求真实，春秋大义自凛然
悼念何方老前辈
王海光 敬挽

何方老千古
历经沧桑驾鹤西去
思想火种常留人间
王春瑜敬挽

改革开放立足和平时代 社会发展基于历史真相
王德禄 刘志光 挽

铁笔硬骨追求真理 无愧中国好男儿
英勇赤胆披露真相 堪称时代大英雄
皖兵敬挽

由延安挨整到庐山株连饱经几十年风霜雨雪
从外事工作转党史研究奉献一系列巨著真言
痛悼何方老前辈
晋阳学子 吴敏 敬挽

老友小友真诚战友
求真写真何方有真
谢小玲 敬挽

何人如君沧桑历尽仍然皓首横眉著信史廊清谁是总书记
方一担当风霜雨雪乃敢拆下肋骨当火把照亮和平发展路
谢健明 沉痛悼念何方老前辈

六十多年受教，良师痛失。哀程门不再，问道无门。

三十余载立言，英才惜陨。叹董狐折笔，诤士消声。

萧扬 痛挽

著言遽绝 谈史忆人 从前苍茫泾渭水

西狩获麟 党史笔记 过后俾睨宝塔山

敬悼何方老

徐庆全 敬挽

翰墨到死，煌煌文章启后世

清白一生，磊磊道德感今朝

徐友渔 崔卫平 敬挽

史志直言昭万世

哲士多彩垂千秋

晚生阎长贵 哀挽

何期真实 先知具足 千年穷变思革命

方以智慧 生发圆满 古今评说两头真

余世存 敬挽

因政治风云 由外交官员而专家学者

为革命感悟 从热诚奉献到灼见真知

曾景忠 敬挽

护众生，青葱怒发拼力争自由

忧国运，皓首横眉奋笔著信史

晚辈展江 沉痛悼念何老

早年投入革命，半生反思延安路
皓首重归初心，一意铸就党史书
痛悼前贤
张弘 敬挽

壮志未酬 前辈英灵驾鹤去
后人永念 秉正精神乘风来
何方先生千古
张立华 敬挽

世上少了一位思想家
天堂多了一个老神仙
张烨 敬挽

树倒根尤存 腐败何碍肥大地
人去书还在 神奇方能撼众生
张勤龙 敬挽

信史成灰日，万里长征犹过客；
方家谢幕时，百年毛病又登台。
何方先生千古
章立凡 敬挽

十载契相知 犹觉兰言在耳
今秋悲永诀 那堪月影招魂
章诒和 敬挽

寻理想，投身洪流，八十年置身风云烟雨，难改少年胸怀；
观世界，寻求真相，三十载笔耕洞世信史，不负真诚初心。

哀悼何方公

晚辈 赵诚 敬挽

何来圣贤，致良知自可教化三千
方今世界，顺潮流才能标高万古
风骨常在

赵锋 敬挽

党史直书 前事昭然有笔记
延安走来 后人知否须反思
挽何方先生

周为民 敬挽

早岁追求自由丧失自由
晚年情系何方路在何方
智效民 敬挽

忧国忧民终生奋斗 无可奈何
患天患地一世追求 未得良方
智效民 再挽

真是当今圣贤
堪称万众师表
一代真人、圣人，我敬我爱的何方老师突然辞世，痛煞我呀！
郑仲兵 敬挽

笔下党史现真史
纸上闻天伫云天
朱海燕 敬挽

真理在何方 何方心上问
真相在何方 何方笔下答
朱海燕 再挽

正直温厚天真
睿智卓见担当
何方先生千古
香港中和 敬挽

日暮愈显苍龙本色，才学识胆，洒遍一身还满。
夜深更感燭火光明，真诚刚毅，泽及三代犹存。
何方先生不朽！
吴迪 叶冰冰 敬挽■

【挽诗 旧体】

悼何方（五言）

冯克力
前听国涌道，
京华得翁教。
忽闻何方老，
驾鹤西去了。

与公未谋面，
幸而获赐稿。
温故老照片，
双双沐其膏。
历史之真相，
冰山见一角。
党内诤诤士，
可怜相继凋。
欲问身后事，
诡谲莫之晓。

悼何方（五绝）

姬 涛

两头真自谦，
赤子心可鉴。
人去笔记在，
党史映青天。

破阵子 九十凭栏回望

陆 纪

九十凭栏回望，
一生烽火烟云。
少小追随强国梦，
耄耋犹怀赤子心。
拍穿马列门。

求索求学求是，
惟实惟善惟真。
罄竹难书专政事，
铁笔如枪德赛人。
焉能拜鬼神？

悼何方（七律）

梁重庆

良知今日在何方？
何方不在史无章！
年少赤胆举大旗，
百岁何方明短长！
秘书血史言真实，
风骨高天在炎黄。
劳其精骨唤子孙，
苦其心志近寒殇。

痛悼何老前辈（四言）

梁列林

九五英杰，驾鹤西飞。历经磨难，愈久弥坚。
思想领先，终生求索。灼见真知，和平发展。
党人忠魂，历程反思。时代新情，风云变幻。
老骥之遽，众所期待。猝然离去，痛乎悲乎！

悼何方（七律）

牟广丰

英魂今日系何方？
党史仍须细考量。
再现真实凭笔记，
还原本色诉衷肠。
一丝不苟求严谨，
两卷重读祭国殇。
华夏百年殷鉴在，
蹉跎岁月漫悠长。

忆秦娥 致宋老师

晓 洲

协和咽，何老西去悲十月。
悲十月，壮志凌云巾幗难别。
雄文漫布红似血，
内助同书思续绝。
思续绝，愿君保重其坚如铁。

渔家傲 痛悼启蒙老师何方同志

周振中

噩耗传来心欲碎，
襟湿片片潜然泪。
多少迷团得教诲，
知真伪。
恩师何处能相会？

怎料病掠精英逝，
千秋遗嘱得安慰。
党有直言民福祉，
留真史。
一身正气尤为贵。■

【挽诗 新体】

不知道——敬悼未曾谋面的何方前辈

郭世佑

不知道这个秋凉你一定要走
还刻意不等月圆了
只知道多次翻阅你的内部印刷厂
还应打量你的肉身
有几斤几两

不知道你是啥级别
头衔怎讲
只知道你从延安走来的方向
多少年了
怎么还是战士的模样

不知道你有啥遗嘱交代
你将孤旅何方
只知道浴血的答卷还没写完
娜拉走了
你也走了

您走了——敬悼何方前辈

何绍义

您走了，却把文字都留下了。
留下的文字就像上膛的子弹，
继续把政客的谎言一一射穿。

您走了，却把声音也留下了。
留下的声音就像啼血的杜鹃，
继续为历史的真相声声呼唤。

您走了，却把思想全留下了。
留下的思想就像照妖的明镜，
继续把人性的丑陋统统曝光。

您走了，却把精神都留下了。
留下的精神就像发光的灯塔，
继续为前行的良知默默护航。

纪念何方前辈并拜读《抗美援朝的得与失》

刘红英

随着最后一口气，
心电图的直线，
重合到北纬 38 度，
平复的波浪里，
埋葬了 183108 颗年轻的中国生命。

在那片被历史窒息的土地上，
你给了他们声音。

静静地，您走了

李占柱

静静地，
您走了。
不愿让这个世界知道。
大洋彼岸的我们，
却听到了你最后一声心跳。

静静地，
您带走了 95 个春秋。
饱含着对谎言的痛恨，
对权贵的无畏，
对真相的追求。

静静地，
大地悲叹，
蓝天泪干，
您的坚韧执着的声音，
永远回荡在人民心中的八宝山。

因为你在东方——悼何方先生

木子鱼

因为你在东方，

其它三个方向，
不知去了何方。

因为你在东方，
所有的指南针，
不再向往南方。

因为你在东方，
太阳
从此升起在西方。

何伯伯，请告诉我您去了何方

王晓林

何伯伯，
请告诉我您去了何方，
以便将来找到您，
像三天前那样，
把手放在您的大手里，
搂着您宽大的肩膀，
贴上您温暖的面颊，
轻轻地告诉您：
“我们自己的出版社，
出版了新的《党史》，
今天刚刚上架。
您看，
我给您带来了一本，
不着急，慢慢看。”

你的名字是一个陈述

应 约

你的名字是一个陈述，
关于方向，光和音的回响。
你的名字是一份探索，
关于真相，更多的真相，
和无法抵达的真相。
你的名字是一声叹息，
关于失去的，
和必将失去的，
四目相望。

今夜，灯光转暗，
世界戴着面具狂欢。
你的名字再一次升起，
箭头所指，
你的座标熠熠闪光。

谁又能说，
你的名字
最终不是一声呼唤？
心安理得的灵魂啊！
脚下是否还有路？
路，究竟通向何方？ ■

【何方资料】

何方年表

1922年10月18日 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一李姓农民家庭。原名李彦贤，去延安后为何方，曾用笔名贺放等。

1930-1937年 先后上农村私塾、县城小学、西安初中。从小学起即参加救亡运动。

1938年暑期到安吴青训班学习一个月，并参加民先队和西青救。后编队从西安徒步去延安，行至泾阳被国民党扣押20余天，转押至西安三青团筹备处后几人相约翻墙逃到八路军办事处。随即和刘澜波等乘车到延安，编入抗大四大队五队学习。

1939年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总校上前方后转入三分校政治队学习，年底毕业。1940年 留校任政治助教。

1941年3月 调入新成立的俄文队学习。

1941年5月 张闻天找去谈反对教条主义、改造学校教育问题。

1942-1944年 转入5月成立的军委俄文学校(后改名延安外国语学校)，并以主要时间参加整风和生产劳动。

1945年9月2日 离开呆了整七年的延安，前往东北工作。路过承德被分配到热河省政府当翻译，不到一月，又随炮兵团去沈阳。在东北局报到时遇张闻天夫妇。

1945年11月 随张闻天夫妇去哈尔滨，分配到中苏友协工作。

1946年1月 到黑龙江省双城县做群众工作，曾任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双城学院主任、县教育科长。

1946年5月 转任兆麟中学教导主任。7月率部分师生进行农村调查，写成调查报告，收进《东北农村调查》一书。8月率工作队进行土改，任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

1947年7月 参加南下工作团赴吉林省东丰县搞土改，任县委委员兼工作队长。

1948年1月 分配到辽宁省辽阳任路西工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从事土改、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

1949年5月 任辽南省青年代表团团长，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会后分配到辽东省任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不久又改任省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1950年1月 随张闻天奉调外交部，参加“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二秘、资料组长，研究国际问题，在北京待命。

1951年4月 随张闻天去驻苏联大使馆，任研究室主任。

1954年 参加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参与起草会议发言等一些内部工作。

1955年3月 调回外交部，先任研究室专员，后任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国际问题，起草和修改部分外交部文件电报，主编《外事动态》、《外交通报》、《外事研究》、《业务研究》等内部刊物，兼任党组秘书和张闻天的工作助手。

1957年2-7月 随张闻天视察我驻印、巴、缅、印尼等国使馆。

1958年2月 随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

1958年7-8月 参加布拉格使节会议。会议前后随张闻天视察我驻苏联、东欧各国及瑞典使馆工作。

1959-1960年 庐山会议后在外交部被定为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并报经中央监委批准给予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处分，下放安徽农村劳动改造。

1960年 在安徽六安县劳动改造，几乎饿死。

1961-1963年 回北京治浮肿病，病好后出任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主编一些内部刊物和起草部领导讲话稿等。

1964-1965年 派赴河北省昌黎县参加农村“四清”。

1966年 被外交部交河北省分配任果树研究所所长，尚未到任即开始“文化大革命”，调回外交部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被部党委定为打倒对象，交群众专政进行批斗和劳动改造。

1969年3月 下放江西上高五七干校，继续进行批斗和劳动改造。1971年被开除党籍，

行政降三级。在干校住了整九年。

1978年 自行离校返京，要求恢复党籍，进行平反。经过半年斗争，在黄华领导下的外交部党委承认错误，正式给予平反，恢复党籍和1959年以前的行政级别等一切待遇。其间曾到《世界知识》帮助工作半年。平反后又经过半年斗争脱离外交部（先是坚决不放）。

1979年 离开外交部到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先后去美国和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1981-1988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83年评为研究员。

1988-1995年，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0年 被评为有特殊贡献者，1991年起领取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起 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1991-2000年 出任中苏(后为中俄)友好协会副会长。俄中友好协会会长季塔连科1999年10月1日颁予俄中友谊奖。

1993年 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 离休，继续进行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研究，并有著作发表。

2007年 被评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11年 被聘为第五届中俄友好协会顾问，任期五年。■

二、媒体报道

1999年离休前从事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五十年里，在这个领域引起媒体或高层领导注意的，主要是1980年代下半期就时代问题发表的论述。根据邓小平1985年关于当今世界存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谈话，1986年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这在全国大概是首次。我说，世界从1950年代起就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但已经过时，而且当时的判断就不准确，对资本主

义作了错误的估计。此论一出，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公开的讨论。初期受到不少单位的邀请作报告，包括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和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防大学当时的校长张震、政治委员李德生亲自写信邀请我去讲时代问题。一些国际问题刊物如《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知识》和中央党校的《理论前沿》，曾组织专题讨论。

围绕时代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十多年，有三段时期相当集中，观点对立鲜明。

第一段是1986到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问题提出后，初始曾引出不少质疑和反对的意见。但不久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认同的意见就逐渐占居多数。第二段是“六四”之后的几年。这时出现大量批判文章。陈云1989年9月8日同李瑞环谈话，说“那种认为《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1990年3月，由邓力群主持，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曾召开四次关于帝国主义和时代问题的座谈会。我在会上坚持原有看法并作进一步阐释。第三段是在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北约飞机轰炸后的一两年。反对意见一时声势较大，甚至出现诸如否认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说目前是处于两次世界大战当中的间隙之类的提法。1992年党的十四大重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并把这个命题提到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高度。之后，直接反对的议论在媒体上大为减少，过了一阵讨论也不那么集中了。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认为，我提出的时代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一定得和世界的改革联系起来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前总编辑萧扬认为，我在时代问题上的论述矛头直指坚持时代仍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观点，直指在时代问题上的误判及其严重后果，突破了在这个影响全局问题上的羁绊。

在改革开放之前从事的国际问题研究，个人成果大都是内部报告，媒体无由接触。这段时期，有些报告曾引起中央领导或外事部门领导高度重视，如1951年《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1954年《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1954年《苏联宣传中避免突出个人》。改革开放后，下面三篇文章受到较大注意并引起反响：1983年《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几点看法》，1991年《过渡时期国际问题的若干问题》，1997年《对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

和意见》（经删改以《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为标题在同年5月11日《环球时报》上公开发表，之后曾在公众中引起议论，并受到新闻管理部门的关切）。

1999年改行研究中共党史以来，主要成果有：《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何方谈史忆人》（部分篇章摘自前两部书）三部专著和不少论文。前两部在成书之前，若干章节已在多家报刊上发表，其中大多得到文摘类报纸转发或被收入年度文史精华选集。成书后不久，电子版在网上得到广泛流传，点击率较高，社会影响较大。读到和听到的一些评论认为，这是在党史领域独树一帜之作，重史实、兼具史识和史胆。中央党校教授盖军在一次会议上说，今后研究党史绕不开何方的《党史笔记》。一些学者如萧扬、丁东和傅国涌等认为，我在党史研究中对“党史编纂学”作了分量很重的反思，起到“颠覆性作用”。丁东认为，这一反思成了“一个思想策源地”。青年学者毕苑还在2009年第6期《领导者》杂志上专就此发表了文章。从网上评论和读者来信中了解到，引起最多注意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1. 通过对史实的澄清和辨析，论证了张闻天是中共一个时期名副其实总书记，并且在重大历史关头做出过重大贡献。201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中华民国史》36册。其中“民国大事记”在“遵义会议”的条目中，加上了“推举张闻天为总书记”这句话。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信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党史的表述中，从来没有这一条（2011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据说，这一确认与我多年的研究成果有关。

2. 认为对延安整风的研究和论证具有独到的见解，包括：上层和普遍两个层次的整风运动（上层整风以清算过去的路线为主要内容，下层整风以抢救运动为主要内容），实际上是通过对于高层领导和青年知识分子的严厉整肃确立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全党上下都成为毛泽东的驯服工具；运动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定了新闻管制和舆论一律等制度，形成了完整的党史编纂学；抢救运动成为共和国成立后各种政治运动的先声；知识分子受到轻视和压制有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国传统两个根源，通过整风又连同轻视理论和轻视知识成为党的传统；整风运动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将持续百年，个人

崇拜现象将长盛不衰。

3. 《何方自述》最后一章讨论几个理论问题——如何看待抗日救亡运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共产党的领导和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先后以《我看社会主义》为题在2007年第7期《炎黄春秋》、以《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2011年8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连续发表四天。这篇专论反响较大，网上有不少回帖给予较高的评价。2011年8月15至17日所见到的文章回复有：“一个对国家与民族真情真心真思真意的老人——元待”；“不撒谎，不欺骗！——斯文汉”；“用国内外的历史事实说话”；“几篇文章说了绝大多数民众的心里话，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问题到对策，论述都很深刻，很切实。通篇充满了对民族前途民运的责任感、使命感。——猿人”。

对这一章，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所著《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年》一书中的《2007——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一节中，把我视为老共产党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说他们始终坚守了对真理的追求，而真理是高于党和主义的；他们认定自己只是真理的探索者，而非真理的把握者与垄断者，因而具有一种自我怀疑、反省自我更新的自觉与能力。傅国涌把包括我在内这一类人称作“八十后”现象，说这些人往往要等到八十岁以后，生命力才能真正呈现出来，创造性完全彰显出来，越到晚年思想越开放，能对党和国家多年的经验教训做出深刻的归纳，并用适当的文本写出来。

《何方谈史忆人》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见到的评价如：

1. 文史学者丁东在《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11月)等报刊上发表的《何方先生印象》一文说：“《党史笔记》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出版后，年逾八旬的何方先生一下子走进公共空间，得到其他领域诸多名人的激赏……（何方的）思维逻辑严密，一丝不苟，见棱见角，锋快犀利。不论评说历史，还是审视现实，绝不人云亦云，含糊其辞……从延安走来的一代人，正在历史的舞台上谢幕。像他这样思想高瞻远瞩，人格特立独行，笔下雄风不减，行文必求新意的人，确乎已经不多了。”此文发表后，曾得到不少报刊摘引。

2. 2010年11月8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读书》《书林折枝》条目说：“该书在呈现生活中、工作上的张闻天各个侧面的同时，还为我们了解新中国早期以及特殊时期领导人的状况提供了一段信史，澄清了党史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在对师友的纪念文章中，作者述及胡耀邦、刘英、李一氓等老一辈革命家，并披露了大量的稀见史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3. 国防大学退休教授林蕴晖在2011年1月27日《南方周末》《我的2010年书单》栏说：本书“对人们不太熟悉的张闻天在中共历史上的贡献（尤其是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介绍和叙述，澄清了很多历史上不确切的传统说法……书中收录的《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一文，向人们展示的中共历史上另一种值得发扬的优良传统，可谓是‘发人之未发，言人之未言’，是当今难得的求真辨伪、秉笔直书的佳作。”

4.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在2011年2月12日《南方周末》《我的2010年书单》栏说：本书“既有历史‘参与者’的直观、生动，披露了许多只有‘亲历者’才可能知道的秘辛，又有研究者的客观态度。”

5. 2010年9月28日《世界新闻报》《新书架》栏，2010年11月12日《湘声报》《每周一书》栏说：“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何方党史笔记的集结。它不是单纯从亲历、亲闻写起，而是从大量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梳理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澄清了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具体而微地书写了自己多年的观察心得与体会。二是作者对师友纪念文章的汇集……书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均为首次披露。”

6. 电子报《新华书目报》说：“明年是建党90周年，而今年是张闻天诞辰110周年，选择这个时机推出这本党史笔记可谓恰逢其时。何方曾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本书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将何方自己跟随张闻天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故事一一阐述开来。书中的史料扎实，逻辑周密，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大的突破，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也触目可见。”

7. 网上发表的《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应为社会主义正名》两文，得到很高的点击率，前者几天内达到八千多。■

三、学术自传

从世界看中国——我的学术自传

（此文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集》一书之约而写，这是未经删节的原稿）

第一，学习经历

我上学的时间不多，只上过私塾、小学和初中一年级。十五岁到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俄文学校学习。上学的经历和我后来从事的研究工作需要并不相称。如果算得上是学术积累的话，主要靠的是自学。我有比较强烈的求知欲，努力做到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争取手不释卷，学点东西。

说来也真有点蹊跷，我从一个学历只有初中一年级的农村孩子，参加革命后竟做了大半辈子的文字工作，被组织上当作“笔杆子”使用，指派研究国际问题，前后加起来也有三四十年。对于国际问题研究，我倒是真可以谈点缘起和感受。当然，在新中国的体制下，不可能有毫不间断的研究，中间总会掺合着一些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等等。例如我从1969年到1978年就被下放到外交部江西上高“五七干校”，连续劳动改造了整九年。不过整个说来，我这辈子的主要工作经历还是研究国际问题。下面就谈点这方面的心得体会。但在言归正传前，也许有必要先做点生平简介。

1922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陕西临潼一个父母都目不识丁的农民家庭，从小就跟着大人干点农活，家里原本也没打算让我上学读书。只是一个偶然机会，改变了这种状况。就是我父亲到集上去买牛，人家却给开了个马票，因而要多纳税。他回家后发现上当，很生气地说，看来不管干什么，都得念几年书，认得些字。于是改变主意，决定供我上学。

我于1931年九岁时才进入私塾读书。两年后，为躲避农村匪患，进了县城里的公立小学。九岁上学，年龄是大了些，但有个好处，就是学得快，曾几次跳班。在因故辍学两年的情况下，还于1937年考进了初中。我当时上的西安二中，校长是著名的老共产党人

江隆基（全国解放后曾当过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兰州大学校长）。他把我们二中办成了陕西全省最著名的进步学校。我在二中开始参加一些抗日救亡活动。在这期间读了大量中国旧的章回体小说，也读了一些鲁迅、田汉、蒋光慈等作家的新文学作品，并开始阅读时事类的报刊。

我不到十六岁就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到现在已经七十八年整。

1938年我还在西安二中上学，7月放暑假，就利用机会，经我的亲戚王维之介绍，进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安吴青训班学习。当时正处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时期，青年学子中多已心潮澎湃，不愿再继续上正规学校，认为那是在民族危亡中的“醉生梦死”，而希望正式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很快就不愿继续在那种旧学校读书了。是在这种潮流中，我决定直接参加抗日，心向延安，准备私逃。所以，在青训班受训一个月后，就和两位同乡同学陈克让、史宗棠相约并带他们北上，徒步去延安。走到半道，却被当地国民党当局扣押，辗转押送设在原西安第一中学的三青团招待所。后在夜间翻墙逃出，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排，终于到达延安。我们三个人，只有我进了抗大，陈、史二人因年龄稍小（不到十五岁），去了陕北工学。我和他们从此失掉联系，一直不知他们的下落。全国解放后，陈克让家中曾想我打听他的所在，说明他一直未同家庭联系，可见早已牺牲于抗日战争中。史宗棠因两家不熟，迄无来往，估计也早已不在人世。如此看来，当年一同参加革命的三个少年，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到了晚年，每想起他们两人，不免后悔当时没有为他们力争和我一起上抗大。

1939年抗大总校开赴敌后，我被编在留驻延安的第三分校。同年年底毕业后留校任政治助教。1941年调俄文学校学俄文，主要是参加整风抢救（抓特务）和生产劳动。1942年发动的延安整风，上层是搞所谓路线斗争，实际上是要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下层是对延安大小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但主要是审查干部、清理阶级队伍，大部分时间是搞抢救运动（抓特务）。

当时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官方党史后来把责任全都推到康生头上）和“文化大革命”

中搞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样，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瞎折腾。当时延安地区的机关学校只有三万脱产人员，但在抢救运动中竟有一半多被“抢救”成“特务”。最后查清全是错案，一个特务也没有，抗日战争胜利后，全部分配工作。抓特务，不是靠调查研究取得真凭实据，而是靠互相攀咬和组织上的怀疑认定。所以我虽然十五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但也被咬成了特务，随即遭到昼夜抢救，被整了两三年。最后宣布弄错了，还编造了个原因，说是由于个人思想意识有问题。我理所当然地拒绝在这种结论上签字，并提出申诉，认为组织上应承担弄错的责任。

在延安整风前这段时期，大家学习的热情高涨。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被抢救，我都争分夺秒地读书。除了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还读了多部中外文学名著。如在抬粪过程中就熟读《红楼梦》。我的办法是，带上书，路好走就看上几页，路难走就默默背诵。因此，至今还背得出书中的大部分诗词。

日本投降后不到半月，我即被派赴东北。1945年9月2日离开延安，经过约两个月行军到沈阳。因偶然遇到张闻天夫妇，随后即跟他们一起去北满。北满分局分配我到黑龙江省双城县做地方工作，先后任双城学院主任、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从事发动群众和剿匪工作。1947年按东北局指示，带领工作队南下，先后到吉林东丰县和辽宁辽阳县搞土改和对敌斗争。1949年5月任辽南省青年代表团团长，赴北平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会后辽南省已撤销，遂被分配到辽东省，任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这时遇上时任省委书记的张闻天，被他看中，调到他的身边。从此被他用作助手，不管安个什么职务名称，工作总是由他直接调遣。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有余。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我被看作他的亲信，也跟着倒霉。反右倾后我再未与他见过面，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却一直存在。

我因文化低，所以一直抓紧利用机会自学。如在东北打游击时，白天驻扎下来，没敌情，就读诸如《西洋哲学史》、《美国十大家族》之类的书。平时行军，途中也可看点名人传记或小说，一天能看个中篇。《苏沃洛夫传》、《库图佐夫传》之类的书籍，就是那

时在行军途中读的。

1950 年随张闻天调外交部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北京待命。1951 年随张闻天去驻苏联使馆，任研究室主任四年。其间写了十多篇调研报告。1954 年被临时调去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从事起草发言稿等文字工作。1955 年调回外交部，先后任政策研究室专员和办公厅副主任，协助张闻天主管部属各单位和驻外使馆的调研工作、为外交部起草一些上呈或下发的文件，平时则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写些调研报告和工作建议，还主办几种给部内外单位和驻外使领馆的通报及内参。

进入外交部门，自然就得研究国际问题。这个时期重点读的是世界史地、国际关系史和世界经济等方面的书。从驻苏使馆回到外交部这五年，是我一生中工作最紧张繁忙、写的文章和报告数量也最多的时期。很难有阅读大部头书籍的时间，我就充分利用长途旅行出差的机会读书。一部《纲鉴易知录》（20 册）就是在一次旅途中读完的。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在反右倾运动中我被打成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

1959 年底外交部反右倾运动一结束，我就被下放到饥荒重灾区安徽六安农村劳动改造。就在每天粮食定量只有三两，几乎饿毙的状况下，我仍然坚持读书看报。除了重读《反杜林论》以及新出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类的政治理论书籍外，还读了一些诗词古文。带下去的一部《聊斋志异》，就翻阅了十多遍。读这些书似乎与国际问题无关，我却不以为然，认为研究国际问题需要广博的知识，读书看报越多越好。

1960 年底回北京住院医治因饥饿而得的浮肿病，病情稍轻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主管研究工作）组长，协助领导管些文件起草和部内外（驻外使领馆）的调研工作。1963 年部党委不让我再在部内工作了（理由是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人不宜接触外交机密），决定调我去国际关系研究所。我提出了调离外交部到地方上去工作的意见。部党委不久又要我先去参加农村“四清”，加入在河北昌黎县的外交部“四清”工作团。参加了两期“四清”，用时一年多，部党委也给我联系好了地方工作，即就地安插，任设在昌黎县的河北

省果树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我虽知自己完全不适应，只是来地方既是自己的要求，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但这时外交部却变了卦，从河北省把我要了回来。原因是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识》副总编辑吴景崧病情严重了，临时又找不到适当人选，于是就找我顶替。我只好重回外交部。但还没来得及报到，“文化大革命”已热火朝天。外交部领导让我别急着上班，先回办公厅参加运动。

从此，我就脱产参加“文化大革命”，前后十余年。运动一开始，部党委为了替自己解围，照例先抛出一批人作为交群众批斗的“牛鬼蛇神”。我就在第一批被抛出的三十五人之列。随即由群众专政、批斗和从事体力劳动。在北京挨整三年，于1969年3月下放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长期改造，前后挨整和劳动九年多。

在这九年里，头两年劳动紧张，管制也严。后逢林彪出逃，对我的专政也逐渐放松。我便利用这个机会重读了《资本论》等大量马列原著。写过一长篇学习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论述的笔记。还研究了点国际问题。日本二战后经济发展迅速，比中国快得多，我因有感，就根据《参考消息》的数据写出一篇数万字长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此文曾送给宦乡等研究国际问题的领导同志参考和指正。这也许与我后来受命筹办日本研究所有关。

经过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总结出了一些人生教训。我参加革命后，就已下定决心，把自己一切献给党，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此后多次挨整，都是逆来顺受，从不计较。但是总觉得这革命怎么还是老往自个儿头上革，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务，1959年硬要定为追随张闻天“反党”，而且一整就是二十多年，这使我感到十分困惑。后来得出结论，不能再逆来顺受，应当学会毛主席的“斗争哲学”，于是决定此后遇到不合理的事就坚决斗争。结果还真灵。经过近一年的斗争，把外交部从1959年起二十多年历次强加在我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和各种错误的处分统统推倒了。部党组在1979年2月28日给我做的《审改决定》中不得不承认，1959年以来对我的定性和处分都“是不对的，应予纠正平反”。这就等于搬掉了长期压在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与此同时，我也希望离开外交部这个整了我二十年的不愉快工作单位。可是，这时的外交部，特别是新任

部长黄华，却坚决不放行。也不给安排合适的工作，就是要把我扣留在外交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给我出点子说，那你就别给它上班。我也真的照办。经过半年斗争，终于调到了社会科学院。

从恢复工作后到 1999 年离休这二十年，是我能够比较顺利和稳定地专心从事研究，一生中学术工作最活跃的时期。学术思想走向成熟，个人在国际问题上的一套基本观点，多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段时间，我集中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特别是一些带理论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如时代问题、全球化、世界格局变化等。还积极支持并参与宦乡倡导和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

这期间的研究成果以内部调研报告为多，此外又增加一项政策建议的内容。1979 年调到中央成立的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同时参与过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酝酿和给中央写报告的工作。如在李一氓主持下建议不再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提法，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能成立”等几个报告；宦乡牵头的“关于拉开与美国的距离、调整对苏关系、改变『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报告”等。

1999 年离休后改行，个人独立研究中共党史，写出《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下册。这一著作使我在学术上确立和增加了一项专长——中共党史研究，并得党史界许多学者的承认。同时，又开始研究个人较熟悉的共和国成立后头三十年外交。直到现在，仍是同时进行党史和外交问题的学习和研究。

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内迎来了一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中央还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在这之后，同以往相比，我的学习和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有了真正的独立思考，以求真探源为目的，根据个人经历和过去的所学所想不断进行反思。凡有所得即书写成文，自以为也算最后对社会做的一点贡献。

还应提到，当张闻天助手的经历，以及我的两位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担任过中顾委常委的李一氓和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影响，对我的学习提高起到重要作用。李一氓的帮助比

较全面，刘英的帮助主要是在党史方面。

第二，研究工作

我的研究工作，从人生历程讲，可以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外交部的十年，即从 1950 年到 1959 年。第二段是 1979 年 8 月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到离休。第三段是 1999 年离休后到现在。我一生的学术活动只限于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这两方面。我虽然做了大半辈子研究工作，但很难说成是学术研究。不过里面也确有学术研究的成分，只是不太容易分出来论述。所以这里就笼统地谈一下我的研究工作。

（一）有点影响的内部调研报告

在外交部十年的研究，写的调研报告不少，但照例是不留底稿不署名，也已记不清题目和内容，只知道都是为当时的外交斗争服务的。现在只举几个还多少记得点内容、并对外交工作起到过一定作用的调研报告为例。

1. 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

1951 年 5 月正当朝鲜战争打得难解难分，处于相持阶段之际，我在张闻天大使指导下写出一份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的内部研究报告》。这是我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后，向外交部和党中央写的第一篇调研报告。由于中国的参战和苏联的援助，美国军队已不可能推进到鸭绿江边，而中苏朝“三驾马车”（毛泽东语）也无力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美朝双方和世界舆论又都希望不要再打下去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张闻天让我以驻苏使馆研究室名义写了这篇调研报告。报告送到外交部和中央后，引起极大重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曾亲自致电使馆，说今后这类报告应以电报发回，交定期的信使带，会贻误时机。

报告虽然没正面提，但实际上是从否定朝鲜战争出发的。因为朝鲜战争是执行推进世界革命路线导致的结果，原因就在于对时代判断的失误。当时的决策者——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认为，二战后世界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打南朝鲜、发动朝鲜战争，就是推进世界革命的一个步骤。但事实证明，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已过时，据此做出的决策不可能成功。在战争僵持于三八线、很难把美国赶出朝鲜、毛泽东也想通过妥协走出战争的

情况下，我们上送了这份报告，因此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一个驻外使馆研究室的调研报告能受到如此重视，不但由于时任大使的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更重要的还是驻苏使馆的报告，正好适应当时中央的决策需要。朝鲜问题的最后解决，实际上也是这个报告设想方案的实现。

2. 关于印度支那的划界分治

1954年日内瓦会议，先讨论朝鲜问题，后谈印度支那问题。前段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后段反而实现了停战和划界分治。我参加朝鲜问题会议后，张闻天就让我回使馆去，不再参加印支问题的会议。

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还不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英法。当时的印支战争，法国已实在打得精疲力竭、难以为继，英国也不愿意法国长期陷入印支泥潭，所以时任英国外相的艾登就提出了“东方洛迦诺”的建议。其实，我方（苏联、中国、越南）想让法国彻底退出印支也是不现实的。何况美国很快插了进来，最后完全取法国而代之。我方当时也想谈出一条停火线，但仍想通过奠边府战役取得更多一点胜利果实，谈出较好的结果，要求过高了些。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的调研报告，分析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底线，无非是停止战争、划界而治、然后维持现状。标明洛迦诺，只是援引1923年欧洲主要国家在意大利洛迦诺签订的维持当时欧洲现状的协议。协议的主要作用在于求得和苏联和平共处，使欧洲脱离战火威胁，赢得一个和平稳定局面。我的报告起到了两个作用，即摸清西方的底牌和说明我方取得胜利的限度，而这两条正是中央亟需了解的。所以当张闻天将我的报告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送交周恩来时，当即得到他的高度赞赏，认为可以对那场外交斗争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事实上，后来会议大体上也就是按此预测进行的，用的时间较快，取得的结果也是在整個印度支那停战，越南分界而治，柬埔寨和老挝实行中立。实际上是法国势力退出印度支那，美国势力进来，中国的援越抗法变成了更长期的援越抗美。

这里还可讲点有关个人工作的一个插曲,说明为什么我没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全过程。张闻天担心周恩来有可能在日内瓦会议开完后把我夹在代表团内一起调回国内,所以他在朝鲜问题会议的最后阶段就让我回使馆,还对我说,看来总理对你很感兴趣。他怕总理提出让我去总理办公室工作,到那时他不得不放。造成我已回使馆的既成事实,总理就不好调了,他也就可以继续把我当作他的助手使用下去了。

3. 个人迷信问题

在驻苏使馆期间,我有一两年投身于追踪和调查研究苏联的反对个人迷信问题。这个问题已超出了为外交斗争服务的范围。

我组织使馆研究室同志和自己就苏联反对个人迷信所写的调研报告,曾在国内引起轰动。那时正是中国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时代,苏联的动向对中国至关重要。1953年斯大林死后,新的苏共中央掀起一阵强劲的反对个人迷信宣传,先只说不应在电影和文学著作中对库图佐夫等沙俄时期人名将搞个人迷信,对斯大林有所影射,后来才直指斯大林。使馆当然要将这一重要情况及时了解清楚并报告国内。因此研究室就在张闻天大使的指导下,集中力量调查研究了苏联反对个人迷信问题,写的有关报告约十来篇,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

毛泽东、刘少奇就分别向全国批发了好几篇,中宣部的《宣教动态》摘要转载了十数篇。这就使反对个人迷信在中国的宣传教育中普及开来,使正在上升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高潮被抑制了几年。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成为1959年批判张闻天(也包括对我这种小干部的批判处理)的一条“罪行”,说在中国反对个人迷信就是反对毛泽东。

这个刚开始出现的词是译成“个人迷信”还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译法符合俄文原意。当时我和延安俄文学校同学、使馆同事李则望等商量来又商量去,最后,为了照顾斯大林,却决定译成“个人崇拜”。从事后效果看,这一译法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后来刘少奇曾提出应译为“个人迷信”,毛泽东则坚持“个人崇拜”的译法。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及学者如胡乔木等,正是利用了这一译法来为个人独裁进行辩护的。

（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这里只简单谈一下个人研究工作中涉及路线和理论问题的思想认识。

1. 卷入建国后两条外交路线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有两条。一条是毛泽东的，认为世界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战争又必然引起革命。所以我们要加强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对内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对外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目标，着力输出革命，口号就是“打倒帝修反”（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民族主义国家的当权派）。建国后头三十年贯彻执行的也就是这条路线。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世界革命路线由于违背世界潮流，不符合时代特征，所以处处碰壁，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并对新诞生的共和国带来巨大损失，造成对外闭关自守和长期孤立。在二战后世界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时期，我们却置身于世界潮流之外，关起门来瞎折腾，接连搞各种运动，特别是反右派和“大跃进”。我们不但丧失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且社会全面倒退，民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单是因人祸饿死的就达三、四千万人。历史证明，这是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痛苦和损失的三十年。陈毅是执行毛泽东路线的。

另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主要为张闻天，主张中国外交的总方针应是和平共处。周恩来思想上认同这一路线，但和张闻天一样，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张闻天认为，当时不存在世界革命形势，世界大战也有可能避免，世界将面临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中国只能也应该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加强国内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就是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长期和平共处，坚持革命不能输出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不去搞什么世界革命。认为输出革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反而会给革命力量带来损失。

倾向和平共处路线的，王稼祥是突出的一位。1962年3月他给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写了一封信（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和伍修权联署），提出对外要和缓一些，援助要量力

而行等后来被归纳为“三和一少”的主张。对这封信的态度，也证明在外交上存在着两条路线。当事人王力在回忆录里谈到的有关情况是，王稼祥先找刘少奇深谈，后写的信。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没有对这封信提出过不同意见。王稼祥的这些主张还反映到他同年3月到6月主持起草的中联部文件和派团参加7月莫斯科裁军会议的方针中；裁军会议后，“有的同志”向毛泽东告了王稼祥，毛在游泳池见了这位同志。“这位同志”显然是陈毅。陈毅同年9月1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说，现在有“三面和一面少”的说法，这股歪风主要是三年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陈毅说，同苏、美、印度的斗争不可避免，应该更多支持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在刊载陈毅发言的会议简报上批：“可看，很好。”后来，毛泽东把这种主张归纳为“对帝修反要和一些，对世界革命的支持要少一些”。文革时，康生更把“罪名”提升为“三降一灭”。而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没有对王稼祥的信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作为张闻天的主要助手和文稿起草者，我当然和他的思想完全一致，也就是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1956年6月我替张闻天写了一篇《论和平共处》（收入《张闻天文集》四），他一字未改就交付打印。原来他想以此作为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但由于毛泽东对他实行打压政策，根本就不让他发言。所以当他领我一起向周恩来送去发言稿（《论和平共处》），以便听取意见后由我作进一步修改时，周恩来大概早已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所以连看也没看就说，关于外交问题，已有陈老总（陈毅，这时为副总理，尚未任命兼外交部长）一个发言，你就不用再讲了。张闻天自然无话可说。我当时就感到，这是毛泽东对他有计划地打压。一次党代表大会，有那么多人发言，张闻天身为政治局委员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竟不能也就外交问题做一个发言。这说明党内毫无民主。

两条路线的另一重大分歧是对二战后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潮的态度。毛泽东认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所有的亚非拉国家都应进行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对它们应加以引导，施加影响。

张闻天 1956 年和我谈过，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建立的也是资产阶级统治，走的自然是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前景的估计，已被二战后的事实证明是不准确的。毛泽东本人后来也做了修正，只是没抓住要害，仅仅修正了涉及一部分民族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而没有改变他关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观点。他 1958 年 9 月 2 日对巴西记者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要就跟帝国主义要就跟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情况，这种观点事实上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印度等许多国家不站在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

1957 年，我随张闻天视察我国驻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大使馆，历时半年多，也对这些战后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由我执笔先后向中央写了好几份调研报告。

我个人经过几年的研究，写了一篇有关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主义国家成长的公开论文，题目是《有关当前民族独立运动的几个问题》，发表在 1959 年第 3 期《国际问题研究》上。这篇文章虽未经张闻天看过，却是立足于他与毛泽东对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不同看法，想用事实反驳《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一基本观点。

2. 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1985 年邓小平提出世界存在两大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1986 年我把这两大问题定性为两大时代特征，并同列宁的战争与革命并列起来，说成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我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只是个过时不过时的问题，而是许多论断当时就不准确。历史已经证明，他对资本主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想当然，实际上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在蓬勃发展，还会继续发展下去。我的意见，当时曾引起理论界的轩然大波，受到一时的围攻，连陈云也参加了批评（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370 页）。但是人们终究还是讲道理的，所以经过近十年的争辩，最后全国

理论界绝大多数已认同和平与发展时代。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我首先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论”已完全站住，几乎没有人再提列宁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了。我也相信，以后再不会有理论界和领导层对“和平与发展时代”做集中的批判了。

关于时代的看法，我是根据列宁主义的理论来套的。和平就是不发生世界大战，发展就是没有暴力革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展望未来，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判断，“和平与发展时代”还将持续下去。而且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类之间也只能是和平的竞赛与斗争，并加强互助合作，共同促进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世界大战是不会再有的了。

我认为，从 1985 年出现“全球化”这个名词起，世界上就急速展现了两大潮流：一是经济市场化，一是政治民主化。这两大时代潮流不可阻挡，还会一直延续下去。我已经发表过文章，提出战后民主化已经历了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现在到了第四波。民主潮流还没有过去。经济要发展，必须市场化；政治要稳定、要进步，必须民主化。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世界潮流，改变不了，只能前进。但是过程会很慢。

第四波碰到中国会怎么样？中国最后也是挡不住的。就像经济市场化一样，谁也挡不住。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也曾看起来非常慢，一战、二战后，市场化都很慢。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参与市场化的国家只有欧美少数国家。出现“全球化”名词的 1985 年是世界经济市场化的一个关键年。在这之后，市场化发展就加快了，从 1985 年开始到 1995 年，基本囊括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全球化的基础就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形成。中国、苏联、印度先后宣布放弃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90% 的国家和人口就是在这一波中被“化”了的。

民主化也是。在苏联东欧巨变时，来势也很凶猛。到第三波，连一些有专制暴力传统或半专制暴力传统的阿拉伯国家都挡不住了，谁还能挡得住？只是它们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卡了壳。专制独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那里，发展会很曲折。一个是加速民主化，

一个是谁搞民主化就杀谁的头、游谁的街。这两种相反的趋势，我们必须都注意到。民主化进程看起来很慢，但还要看到这当中的深度变化。“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个潮流是阻挡不住的，迟早会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卷了进去。不管古老文明有多么悠久，中国是躲不开这两大世界潮流的。这就是“全球化”，不主动“化”，也会被动地“化”。

学界有人认为，时代问题可能是我在五十年国际问题研究中所作的最突出贡献。我不敢说真有什么贡献。只是俄罗斯远东研究所 1993 年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主要的根据就是 I 有关时代问题的研究和论著。

3. 在日本和苏联等问题上提出个人的不同看法

(1) 由于担任了八年的日本所所长，在研究国际问题时，如何认识日本和处理好中日关系，一直是我在国际关系中的研究重点之一。我有两个基本观点一直未变：第一，走军国主义道路在日本已成历史。这既由时代特点决定，也是因为日本执政当局先被迫后自觉地走上了和平与发展道路。第二，中日两国应该也可能像德法这两个世仇已经做到了的那样，世代友好下去。两国关系的顺逆，同两国相互认知和政策选择的变化相连。因为我较早就开始写出文章宣讲我的这些观点，一些学者也称我是“对日新思维”的开创者。

我 1997 年写的《对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一文，针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并引起不小争议。也受到当时日本舆论的重视。我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战败后的日本，无论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形势，都不容许它重走老路，“复活军国主义”在今后的日本已不再可能了。

在增进相互间的认知方面，我认为，日本有个右倾化和缺乏民族犯罪感的问题，我们则有个把历史宿怨放到两国关系合适地位上的问题。

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过去一直没有把日本的对外侵略看成和说成是日本的民族犯罪，而总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还强调他们只是“一小撮”）和支持并追随他们的广大群众严格区分开来。这就不如欧美人看德国。欧美人认为德国法西斯的胡作非为，既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的罪行，也是整个德国民族的犯

罪。由于德国人自己也认识到希特勒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属于民族犯罪，特别是反法西斯势力战后取代了纳粹的统治，所以才有近乎全民的普遍反思；才有禁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活动的法制；才有战败后东部领土被割去一大片也一直没有再提领土问题；才有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在华沙对犹太人死难者的下跪，等等。这都和日本形成鲜明对照。

(2) 我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是同时代及世界格局变化的研究相结合的。1979年邓小平指示研究苏联问题，成立了一个由十多二十人组成的研究写作小组，准备写出一部《苏联是怎样变修的》或叫《社会帝国主义论》之类的书。小组由胡乔木挂名当组长，管事的是副组长宦乡。我参加了这个小组。我们初步研究的结论是，这本书没法子写。一是写此书势必要揭发斯大林，而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和赫鲁晓夫等长期进行激烈的论战，反对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二是我们革命胜利后几乎全盘照搬苏联模式，批判苏联就等于揭发自己，容易搞乱舆论。大家主张停止这一工程，并报中央同意，小组也就自行解散了。这等于说，以前我们对苏联的观察并不对头，必须来一个重新认识。

在苏联解体前，我在中央党校和政协小组会议上提出“苏共气数已尽”的看法。与会的同志和当年听我说时代已变时一样，大为吃惊。2007年我写《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代表了我对十月革命的性质、苏联模式以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思考。

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不可分。研究双方在分裂上的责任问题，不能只把责任推到苏联头上。1998年4月，我参加了根据江泽民的要求召开的《如何认识60年代中苏大论战》专题讨论会，在会上我谈到中苏分裂和毛泽东对时代判断错误的关系，提出，在党的关系破裂上，主要责任在我们党，亦即在毛泽东。

(3) 其他问题

社科院为学部委员和名誉学部委员出文集，我的那本书所以定名为《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就是因为我发表的文章往往同当时的主流看法不大一样。除了前述日本和苏联问题外，其他的例如：针对多年的“南北差距不断扩大”论，提出南北差距已经缩小而且还在进一步缩小；对于全球化，多数看法先是不愿承认这一发展，后又想把对全球化的认

识和接受局限于经济领域。我写了多篇文章，论证全球化和时代的关系，以及全球化的覆盖面是各领域和全方位，对人类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三）中共党史研究

我写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厘清了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纠正了延安整风期间制造的两个不实之词。一个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实际上只是确定他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至于全党领导，那就更谈不上。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集体领导。这一体制延续了三年，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才成为实际上的领袖，名义上则直到1943年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另一个是说，延安整风是整教条主义的根源共产国际和苏联斯大林的风。这也是事后诸葛亮的编撰。实际上，毛泽东是利用苏德战争，苏联及其掌控下的共产国际无暇他顾之际，在上层，用发动整风算历史账的方式，批倒以前的领导人，给他们分别戴上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帽子，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和对自我的个人迷信。在下层，是把我们这些革命知识青年改造为党的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开创的政治局面和进行政治运动的方式，影响至少当以百年计。

我的党史著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例如，中央党校一位教党史的退休教授在一次讨论党史问题会议上说，今后再写党史，绕不过何方同志写的《党史笔记》。

无论是学习还是从事研究，我一生都在追求真知和真理。我走弯路的时间不短。原因是对革命领袖的迷信和思想上的自我禁锢。七十八年的革命和工作经历，对中共党史和国际问题的研究，使我到晚年不断对早年所学所信的一切进行反思。我的两个研究领域，让我总是把中国和世界、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这些问题包括：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主张究竟是一种必须坚信不疑的教义和信仰，还只是探索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革命的目标及手段的理论和学说。

学界耆宿周有光老先生有一句名言：“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我很

赞同周老的这个观点。只有从世界看中国，才能对中国取得的成功和遭到的失败做出科学的分析判断，才能看清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真实地位，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抉择。

过去的思想禁锢，正是来自只从中国看世界。我们长期习惯于一切按毛泽东的认识和判断来观察和了解本国及外国的事物。结果是对国内外情况的认识出现巨大偏差，形势判断和政策选择不断出错。拿时代问题来说，毛泽东的判断错了，他据此做出的战略决策也就错了。明明大战打不起来，我们长时间为备战和“三线”建设花了多少人力财力物力！明明并无世界革命形势，我们又为支持外国的革命花了多少人力财力物力！这样做的结果，是对我国的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阻滞作用。

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毛泽东的出发点常常是国内的政治需要，不管国外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他多次说过，国际紧张局势对团结内部和对发动革命有利，因此往往在局势并不那么紧张时依然强调紧张。著名的例子如1973年外交部写的153号《新情况》。这篇形势报告反映了当时美苏关系有所缓和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却大不以为然，说是这违背了他的判断：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其实这“三大”并不是当时世界大势的恰当概括。二战后，总体上讲，世界正是相对和平与稳定的。何况毛泽东这次的主要意思也不是讨论国际形势，而是借此向周恩来发难。

只提倡从本国看世界，忽视从世界看本国，可说是专制政治的一种共性。在这类国家，往往根据本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来观察、评价和对待外界事物，总是把自己看成或者说成比外国强。对于本国存在的种种缺陷，看成或说成是内因先天不足，外因外强的一贯欺凌敌视。在这类国家里，求得真知和真理，必须有一点奋斗和无畏的精神。

对于身在其中七八十年的中国共产党，自认为了解得还比较透，至于学术研究，我知识领域的缺项较多，使我对历史、世界和理论问题的认识也只能达到目前这样的水平，其中的不足乃至错误肯定不少。

我的学术自传就写到这里为止。■

2016年3月31日写完，7月修订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寒于水